

## 路德維希·里斯的 史學理論及其歷史背景

陳致宏\*

本文探討德國猶太裔史家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史學理論的內容及其發展的學術史背景。里斯曾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 15 年(1887–1902)，對日本史學的現代化有重大貢獻。他在日本工作期間開始構思自己的史學理論，回到德國後將其進一步發展，並在 1912 年出版《歷史知識理論》(*Historik*)。本文試圖以日本和德國的史學發展作為背景，探討里斯史學理論的特色，以及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和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對此的影響。本文第一章討論當代東亞和西方史學界對里斯的觀感；第二章介紹里斯的生平與學術經歷；第三章進一步探討他在日本教學與研究工作的細節，並論證里斯的日本經驗是他發展史學理論的動機；第四章探討里斯史學理論的特色，特別是他與上一輩史家的異同；第五章著重分析里斯史學理論中最具特色的「系統論」，藉此說明里斯將人物性格的掌握和描寫視為史家最重要的任務；第六章介紹里斯所屬「新蘭克學派」的特色與立場，並說明他與此學派其他史家的異同。本文的論點是，里斯非常推崇蘭克對歷史人物性格的描寫功力，但蘭克並未撰寫自己的歷史理論。里斯受朵伊森啟發而建構一套自己的史學理論，藉此系統性地闡釋前者心目中的蘭克史學，以捍衛德國歷史主義史學對偉大人物的重視，並抗拒以社會結構和集體心理為重點的史學新潮流。

關鍵詞：歷史理論、德國歷史主義、路德維希·里斯、蘭克、朵伊森、新蘭克學派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本文旨在探討德國史家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史學理論的內容與發展背景，並說明他在德國史學史中的角色。里斯將近代西方史學方法引入日本，被日本史學界譽為「日本近代史學的恩人」和「日本近代史學之父」。<sup>1</sup>臺灣史學界則重視他在 1897 年發表〈福爾摩沙島史〉(“Die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舊譯《臺灣島史》)，因為這部作品被視為學院書寫臺灣史的里程碑。<sup>2</sup>相較於里斯在東亞史學界的知名度，這位史家在西方史學界的名氣較低，除了里斯與日本的關係外，西方的史學史著作鮮少提到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未被大多數德國出版的名人錄所收錄，<sup>3</sup>甚至專門收錄德語區史家的《德奧瑞史學人物字典》也是如此。<sup>4</sup>《岩波西洋人名辭典》和《猶太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Judaica*)是少數的例外，<sup>5</sup>前者收錄里斯是基於他在日本的經歷，後者則

<sup>1</sup> 分別出自林健太郎，〈リース博士のこと〉，《文藝春秋》，51：12(東京，1973)，頁 83。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人文科学〉(東京：鹿島出版会，1976)，頁 135。

<sup>2</sup>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頁 164。

<sup>3</sup> 不論是 20 世紀初由 Hermann Degener (1874–1943) 主編，收錄超過 2 萬名德國當代名人生平的工具書《這是誰？》(*Wer ist's?*)，還是巴伐利亞科學院歷史委員會(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所編，自 1953 年起出版的《新德意志人物誌》(*Neue Deutsche Biographie*)都沒有收錄里斯的條目。

<sup>4</sup> Wolfgang Weber ed., *Biographisches Lexiko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die Lehrstuhlinhaber für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des Faches bis 1970*, 2nd e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87).

<sup>5</sup> 〈リース Riess, Ludwig〉，收入《岩波西洋人名辭典》(東京：岩波書店，

是因為他的猶太裔身分，且他多半是基於這兩種原因而成為史學史的研究對象。<sup>6</sup>正因如此，大多數以西洋史學為主的通論性史學史著作並不會提到他的名字。<sup>7</sup>自本世紀初開始，隨著西方史學界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風潮，通論性的史學史著作開始重視非西方地區的史學傳統，以及不同文化圈之間的史學交流，里斯才因他對日本的影響而受到較多的關注。<sup>8</sup>

---

1956)，頁 1639；Hyman Kublin，“Riess, Ludwig,”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17, ed. Michael Berenbaum and Fred Skolnik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7), 294. 後者將里斯出生地誤寫為德國中部的圖靈根地區(Thuringia)。

<sup>6</sup> 許多涉及東亞史學現代化的研究著作都有提到里斯的名字，例如 Margaret Mehl, *Eine Vergangenheit für die japanische Nation: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chen Forschungsinstituts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1869–1895)* (Frankfurt am Main: P. Lang, 1992) 及其修訂後的英文版 *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1st. pbk. print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John S.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The Age of the Gods and Emperor Jimmu*. Paperback repr (Vancouver: UBC Press, 1999) 以及 Michael Facius, “A Rankean Moment in Japan: The Persona of the Historia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 1900,”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9:1 (October 2020): 1–24.; 藍弘岳，〈近代日本帝國大學「新史學」的發展與臺灣史研究〉，《新史學》，33：1(臺北，2022)，頁 13–67 等。此外，Charles E. McClelland 在 *The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討論里斯的猶太裔身分、他的英國史研究和他在德國史學界的發展。

<sup>7</sup> 例如 Ernst Breisach 的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和 John W. Burrow 的 *A History of Histories* (London: Allen Lane, 2007)。

<sup>8</sup> 此類通論性史學史著作包括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2nd ed. (London:

由此可見，不論在東亞還是西方的史學界，主要以東西學術交流史的角度討論里斯的貢獻。但筆者認為，如果只從這個角度切入研究，這位史家的形象或許會顯得過於平板。除了與日本及東亞有關的研究和學術活動之外，里斯的史學著作涵蓋英國史、歐洲早期近代史與史學理論等領域，此外他也撰寫知識普及性的世界史著作。里斯在柏林大學接受專業史學訓練，且相當服膺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為代表的德國歷史主義傳統。在當時德國史學已呈現專業化和學科內部分化的情況下，里斯廣泛的涉獵範圍可說是相當特別。更重要的是，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新蘭克學派(Neo-Rankean School)中，里斯是唯一發展出一套史學理論的成員。

儘管如此，至今與里斯有關的研究大多偏重於里斯對日本史學的影響和貢獻，較少深入探討其史學思想的內容。<sup>9</sup>筆者認為，里斯的史

---

Routledge, 2017), 114–117 以及 Daniel R. Woolf, et al.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4, 180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7, 499, 501.

- <sup>9</sup> 日本學者對里斯的研究有許多貢獻，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金井圓，他在 1976 年發表一部里斯的傳記(《お雇い外国人：人文科学》[東京：鹿島出版会，1976])，在 1978 年撰文介紹里斯使用的日本海外關係史料(《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と日本関係海外史料》，《史學雜誌》，87：10[東京，1978]，頁 1449–1459)，此外他在同一年也與吉見周子共同發表里斯女兒加藤政子(原姓大塚)的訪談錄(《我が父はお雇い外国人：加藤政子談話》[東京：合同出版，1978])。早島瑛在 2002 年撰文討論里斯返回德國後的經歷(《近代ドイツ大学史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商學論究》，50：1[西宮，2002]，頁 565–592)，而西川洋一則發表過數篇與里斯有關的文章，分別是 2002 年發表藏於柏林國立圖書館的里斯書信的日文翻譯(《ベルリン国立図書館所蔵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書簡について》，《国家学会雜誌》，115[東京，2002]，頁 383–427)、2003 年發表探討里斯在日本和德國學術經歷的(《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收入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歴史学と史料研究》[東京：山川

學理論是其特殊經歷和德國歷史主義傳統交互影響的產物。最初他為了在東京帝國大學(以下簡稱「東大」)教授史學方法，而開始建構一套歷史理論，同時也藉由這套理論對抗其他新興學科的挑戰，以捍衛歷史學的獨立性。本文試圖深入探討里斯史學理論發展的背景及其特色，在接下來的第二章裡介紹里斯的生平與學術經歷，重點在於他在柏林大學就讀時所受的影響，以及他在日本的工作與生活。在第三章裡筆者進一步深入探討里斯在日本的工作環境，以及他在東大教學與研究的細節，分析他為何為東大學生編寫課程講義和撰寫史學方法論講義的心路歷程，藉此說明里斯發展自己史學理論的契機。第四章探討里斯回到德國之後的史學理論發展，並比較他和前輩史家在理論上的異同，以凸顯里斯史學理論的特色。第五章著重分析里斯史學理論中最具特色的「系統論」，藉此說明里斯重視歷史人物的性格特質，他認為對人物性格的掌握和描寫是歷史學最重要的任務，而這正是歷史學與其他學科有所區別之處。第六章介紹新蘭克學派的特色與立場，並說明里斯與此學派其他成員的關係，並比較他們對蘭克史學的觀點有何異同，以凸顯里斯史學理論的獨特之處。

---

出版社，2003]，頁202–233)，在2008年撰文探討里斯對日本的影響(“‘Genius des Okzidents’: zur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ür das moderne Staatsdenken in Japan,” *Zeitschrift für Staats- und Europawissenschaften* 5:3–4 [2008]: 334–357)。德國漢學家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整理了一份詳盡的里斯相關書目(“Zum publizistischen Wirken von Ludwig Rieß (1861–1928) in Japan und Deutschland. Ein Schriftenverzeichnis,” *Japonica Humboldtiana* 20 (2018): 257–276)。此外姚紹基在2019年發表里斯《福爾摩沙島史》的新中譯版，並為此撰寫一篇詳盡的導讀，見姚紹基，〈導讀〉，收入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2–15。

## 二、里斯的生平與學術經歷

路德維希·里斯在 1861 年 12 月 1 日出生於普魯士王國西普魯士省的德意志王冠城 (Deutsch Krone，此地自 1945 年成為波蘭領土，現名瓦烏奇 [Wałcz])，他出身自使用德語的猶太裔家庭，父親是毛皮貿易商。里斯在 1880 年進入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學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 研讀歷史。此校現名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在史學專業化過程裡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柏林就讀的期間，里斯修習了朵伊森 (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蒙森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魏茨瑟克 (Julius Weizsäcker, 1828–1889)、布勒斯勞 (Harry Bresslau, 1848–1926) 與戴布呂克 (Hans Delbrück, 1848–1929) 等著名史家的課程。<sup>10</sup> 日後里斯在東京任教時，他常被視為蘭克的學生，但蘭克在 1871 年便已退休，<sup>11</sup> 而里斯在 1880 年才進入柏林大學，沒有聽這位大師講課的機會。當時的蘭克已是八十幾歲的高齡，視力幾近全盲，但仍全心投入《世界史》(Weltgeschichte) 的寫作，且為此需要他人協助史料和稿件的謄寫。里斯曾以抄寫員的身分與年邁的蘭克有過兩次面談經驗。<sup>12</sup>

里斯在 1884 年 2 月前往英國和愛爾蘭收集史料，同年 6 月返回柏林，7 月通過學位論文口試，獲得博士學位。里斯的指導教授是戴布呂克。他的博士論文在隔年出版，標題為《中世紀英格蘭議會選舉權》(Geschichte des Wahlrechts zum englischen Parlament)。之後他通過了中學教

<sup>10</sup> HU UA, Universitäts-Registatur. Litr. A. No. 6. Vol. 736, No. 21.

<sup>11</sup> Gunter Berg, *Leopold von Ranke als akademischer Lehrer: Studien zu seinen Vorlesungen und seinem Geschichtsdenk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8), 50.

<sup>12</sup>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 137。

師資格考試，但卻一心想要從事研究工作，因此不久後又前往蘇格蘭和愛爾蘭等地收集研究材料，直到 6 月才回到柏林。隔年 6 月又第三度前往英格蘭和蘇格蘭收集資料。里斯第三度赴英收集史料的期間，收到日本使館發來電報，詢問是否有意願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里斯很快地答應了日本的招聘，匆匆返回德國，在柏林待了幾日之後，便啟程前往日本，並在船上研讀日本史。里斯在 1887 年 2 月抵達日本，並與東京帝國大學簽約，擔任該校的史學教師，時年 26 歲。<sup>13</sup>

在幕末與明治維新時期，為了促進國家的現代化，日本政府以高薪聘用各領域的外國專家，協助日本在醫學、經濟、工程、人文等各領域的學術發展。這批外國專家被稱為「御雇外國人」(お雇い外国人)，里斯是這批外籍專家中負責推動日本史學現代化的重要人物。根據姚紹基的推算，里斯在日本的月薪不亞於當時德國擁有講座的教授薪資。<sup>14</sup>當時的他只是一位尚未取得大學任教資格(Habilitation)的 26 歲年輕博士，就算取得該資格，在德國大學也會先以編外講師(Privatdozent，或譯為「私講師」)的身分任教，這類教師主要收入來源是學生繳交的聽課費用，無固定的月薪，自然無法與當時日本提供的待遇相比。

里斯原本的研究領域是英國史，自從在日本教書之後，他也開始進行東亞歷史的研究。里斯研究的題目多半與日本涉外關係史有關，且都是以期刊論文的形式發表。他的《福爾摩沙島史》正是這個時期所發表的著作。<sup>15</sup>此外，他也曾在東大開設過「臺灣史」的課程。<sup>16</sup>除了這門課程之外，里斯在該校開設的課程大多仍以西洋史和史學方法

13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 138-139。

14 姚紹基，〈導讀〉，頁 8。

15 Ludwig Riess,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in Tokio* 6:59 (1897): 405-447.

16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 151。

等領域為主，例如「德意志近世史」、「普法戰爭為基礎的歷史根源研究」、「塔西佗德意志史研究」、「英國憲法史」、「法國革命史」、「歷史地理編纂法」、「歷史編纂法」、「歐洲近世史」、「西洋古代史」、「史學編纂法」等。<sup>17</sup>

里斯在抵達日本的隔年與其日籍廚師的女兒大塚ふく(?-1947)結婚，兩人婚後育有4女1子。日本政府與里斯所簽工作合約為期三年，1887年首次簽約，之後每隔三年(1890、1893、1896及1899)續約。1902年，41歲的里斯工作合約再次期滿，但這次日本政府不再與他續約。此後里斯獨自返回德國，而他的妻子和子女則留在日本生活。根據林健太郎轉述里斯外孫阿部秀夫(1910-1948)的說法，里斯不滿某位比自己資淺的德國同事在晉薪後高於自己的薪資，而自身卻未獲加薪，便向日本政府提出加薪要求，而日本政府便趁勢不再與里斯續約。其背後原因是當時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1855-1917)為了讓自己的弟弟箕作元八(1862-1919)取得教授職位，才終止了與里斯的合約。<sup>18</sup>根據金井圓的轉述，阿部治子(阿部秀夫之妻)指出里斯的妻子和兒女都在日本，因此有在日本長居的意願，他之所以離開日本，一定是有不得不然的原因。<sup>19</sup>

返回德國後，里斯在1903年取得大學任教資格，成為柏林大學的編外講師。(他曾在1909年暑假回到日本拜訪家人及過去的學生和同事。)1925年，里斯在柏林大學升為無公職身分之編外教授(nicht beamteter 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sup>20</sup>里斯終身都沒有取得教授講座。當他的恩師戴布呂克在

<sup>17</sup>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148-151。

<sup>18</sup> Hayashi Kentarō, "Ludwig Riess, einer der Väter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Japan," in *Japan-Sammlungen in Museen Mitteleuropas: Geschichte, Aufbau und gegenwärtige Probleme*, ed. Josef Kreiner and Maria-Verena Blümmel (Bonn: Förderverein "Bonner Zeitschrift für Japanologie", 1981), 31-45. Here 34.

<sup>19</sup>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183。

<sup>20</sup> HU UA, Phil.Fak. 01, Nr. 1471, fol. 400.

1921年退休時，柏林大學哲學院請校內同仁推薦適合接受空缺教授講座的人選。當時曾有少數人將里斯納入推薦名單，理由都與他所涉獵的廣泛領域有關，其中一位推薦者恩斯特·佩雷斯(Ernst Perels, 1882–1945)將里斯列在推薦名單的最後一名(第三名)，並指出：「與其說是專精於特定領域的研究者，更不如說他是興趣廣泛的博學者。」<sup>21</sup>在當時德國專業史學已經高度分化的情況下，他在日本難以就原本專精的歐洲中世紀史做更多進一步的研究，而他所寫的東亞史著作和通論性世界史更給人研究不夠專注的印象，這些著作對他在學術界的晉升並無太大幫助。

里斯在柏林大學任教期間(1903–1928)將研究重心轉回歐洲史，代表作是《教宗保祿四世與他的姪子們：十六世紀的一個世界史危機》(*Die Politik Pauls IV. und seiner Nepoten: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Krisis des 16. Jahrhunderts*, 1909)。<sup>22</sup>此書改寫自他在1903年申請大學任教資格時所提交的論文。里斯還在1912年出版了一部史學理論著作《歷史知識理論：一個歷史思考與研究的工具》(*Historik: Ein Organon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sup>23</sup>其他著作則多屬普及性和通論性書籍。此外，他也重編了19世紀德國史家喬治·韋伯(Georg Weber, 1808–1888)的世界史著作。<sup>24</sup>

<sup>21</sup> HU UA Phil. Fak. 01, Nr. 1469, fol. 239.

<sup>22</sup> Ludwig Riess, *Die Politik Pauls IV. und seiner Nepoten: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Krisis des 16. Jahrhunderts* (Berlin: Emil Ebering, 1909).

<sup>23</sup> Ludwig Riess, *Historik, Ein Organon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 vol. 1 (Berlin: De Gruyter, 1912).

<sup>24</sup> 里斯重寫的喬治·韋伯世界史著作包括《喬治·韋伯的十六卷世界通史》(*Georg Webers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in 16 Bänden*, Bde. 1–4. 3. Aufl. [Leipzig: Wilhelm Engelmann, 1919–1922])和簡明版的《兩卷版喬治·韋伯世界史》(*Georg Webers Weltgeschichte in 2 Bänden*, Bde. 1–2. 3. Aufl. [Leipzig: Wilhelm Engelmann, 1918])。前者只出版了前四卷，出版年代介於1919至1922年之間；後者出版於1918年，並在1924年發行新的擴編

儘管里斯返德後發表的專書多以歐洲史為主，但德國學界也多視他為東亞史的專家。<sup>25</sup>里斯在多種期刊和報紙上發表過諸多與東亞相關的文章，並將其中近 40 篇與日本有關的文章集結成兩小冊的《日本雜記》(*Allerlei aus Japan*)。<sup>26</sup>此外，他在柏林大學講授過幾次日本史課程，包括「日本史概覽」(*Japanische Geschichte im Überblick*, 1904/05 冬季學期)、「日本人對東亞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改變」(*Die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Umgestaltung Ostasiens durch die Japaner*, 1922/23 冬季學期)與「日本史」(*Geschichte Japans*, 1923 夏季學期)。但大部分的課程仍與英美歷史、歐洲史、世界通史、史學導論和史學方法論有關。<sup>27</sup>

1926 年，里斯前往美國俄亥俄州春田市(Springfield, Ohio)的維騰堡學院(Wittenberg College)客座，<sup>28</sup>原本計畫順便從美國前往日本探望親友，不料抵達美國後突然生病，只好提前返回德國。1928 年，里斯外出散步途中遭蟲咬引發嚴重過敏反應，幾日後過世，享年 68 歲。

與其他同輩的德國專業史家相比，里斯的經歷相當特別，而如此特別的經歷也引發了他建構史學理論的企圖。里斯的史學理論最早展

---

版《三卷版喬治·韋伯世界史》(*Weber-Riess Weltgeschichte in Drei Bänden*, Bde. 1–3. 2. Aufl. [Leipzig: Wilhelm Engelmann, 1924])。

<sup>25</sup> 當里斯在 1903 年申請大學任教資格時，程序中所要求的公開演講提供了三個題目讓審查方勾選：「理查二世在英國史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Königs Richard II. in der englischen Geschichte*)、「民主概念在 17 世紀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demokratischen Ideen im 17. Jahrhundert*)和「忽必烈汗征服日本的嘗試」(*Kublai-Khan's Versuch Japan zu unterwerfen*)，而最後被挑中的是第三個題目。由此可見柏林大學聘任里斯時，頗為重視他所擁有的東亞歷史知識。HU UA, Phil.Fak.01, Nr. 1226, fols. 114a–114b.

<sup>26</sup> Ludwig Riess, *Allerlei aus Japan*. 2 vols., 2. Aufl. (Berlin: Expedition der Deutschen Bücherei, 1905).

<sup>27</sup> 西川洋一，〈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頁 231–232。

<sup>28</sup> HU UA UK Personalia, R 145 Riess, Ludwig, fol. 2r.

現在他為東大史學方法論課程而編寫的講義，在構思講義的過程中，他開始逐漸建構自己的歷史理論。回到德國後，他在 1912 年出版《歷史知識理論》，此作展現更完整的理論樣貌。為了了解里斯史學理論成形的過程，我們必須了解他在東大教學的狀況。

### 三、里斯在東大的活動與其史學理論的成形

在柏林的國立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手稿部門所收藏的戴布呂克遺物(Nachlass Hans Delbrück)之中，包含里斯寫給老師戴布呂克的 23 封書信，其中 14 封是從日本寄出，它們完整地涵蓋了里斯在日本工作的 15 年期間。此外，里斯所教過的幾位東大學生也曾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里斯上課的狀況。藉由這些資料和里斯在這段期間發表的著作，我們可以大致還原他在東大的工作樣貌，並重建其歷史理論的發展背景。

里斯在柏林大學接受專業史學訓練，在赴日之前，他的工作方式與當時史學界的同行沒有太大的差異，都涉及大量的檔案搜集和考證工作：他在柏林大學的博士論文以英國中世紀議會為主題，並為此前往倫敦、愛丁堡和都柏林收集檔案資料，畢業之後又在 1885 和 1886 年兩度赴英尋找檔案資料。在 19 世紀德國史學專業化之後，檔案資料成為專業史學研究最重視的史料來源，相關史料的搜集(Heuristik)和考證(Kritik)，則被視為專業史學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專業史家所寫的大多是考證性質的論著，而通論性的著作則常被排斥在專業史學之外。在赴日工作之後，因為學術和文化環境的不同，里斯開始走上一條與德國同行相當不同的學術道路。

里斯所任教的東大創立於 1877 年，最初名為東京大學，1886 年改名為帝國大學，在 1897 年又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在創校之初，

東大文學部的第一科便包含史學，但在 1879 年史學因缺乏師資而遭到廢除，直到 1887 年里斯赴日後才重新設置「史學科」，教學內容以世界史為主。<sup>29</sup>除了里斯之外，當時在東大負責世界史課程的教師還有日本人坪井久馬三(1859–1936)與蘇格蘭人狄克生(James Main Dixon, 1856–1933)。坪井久馬三在 1887 年的下半年就被派往歐洲留學，而狄克生則是英語文學的專家，對世界史的教學不太上手。由此可見，里斯在東大任教之後，對該校的世界史教學發揮了重要的影響，而他當時面對的可說是非常艱鉅的工作。

里斯曾在書信中評論過這兩位講授世界史的同事，指出坪井久馬三的能力仍不足以擔任世界史教師，更認為他應該去德國「好好地重頭學習歷史」，因此讚許他赴歐留學的決定。<sup>30</sup>而狄克生也沒有受過專業的史學訓練，卻被要求講授一些與西方歷史有關的課程，並為此深感困擾。里斯在信裡不只一處提及狄克生所遭遇的困境，也樂於敘述自己在此間扮演的「救火隊」角色。在一門開給二年級政治學主修者的課上，狄克生採用英國史家詹姆士·布賴斯(James Bryce, 1838–1922)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作為教本。課程在學期進行三分之一以後，狄克生請里斯接手，並要求他用原本的上課方式完成剩下的三分之二，對此里斯在信裡提到：

讓我驚駭的是，[向學生]問過非常簡單的問題之後，我發現至今[狄克生]所教過的內容並未留下任何痕跡。學生們解釋，布賴斯的書裡只有反思，沒有史實，而我也很快地確認此書確實雜亂無章，於是我把此書的所有樣本還給大學圖書館，這些書是一年前基於狄克生的要求才訂購的。接著，我先以百科全書式的方法介紹一些不可或缺的概念(國家、民族、宗教、教會、社會、政黨、政治勢力

<sup>29</sup> 藍弘岳，〈近代日本帝國大學「新史學」的發展與臺灣史研究〉，頁 23。

<sup>30</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5r.

均衡、自由等)……之後開始講世界史，每週用4個鐘頭的時間仔細地講到希臘化時代，之後再概略地講至中世紀初期。課程的主要概念當然是來自蘭克的《世界史》和《教皇史》。結果有半數學生考試的表現讓我非常滿意。<sup>31</sup>

這不是里斯唯一從狄克生接手的課程，在另一門「英國憲法史」課程中，里斯提到：

狄克生親口告訴我，他認為讓學生在課堂上讀幾則中篇小說和一則長篇小說是有益的，因為這可以增進他們的英文能力，而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教憲政史。於是我花了更大的心力來上這門兩個鐘頭的課，我把課程內容寫成稿子，送去膠印，並在課前分發，好讓我在上課時有更多解釋和補充的時間。學生們非常感激這個新的做法，不像布瑟(Ludwig Busse, 1862–1907)所預言的，他們完全沒有翹課，而是在講義的空白處寫下無數的筆記。我認為日本實在太缺歐洲書籍，才会有這種詳記枝微末節的狂熱。<sup>32</sup>

除了世界史的教學之外，里斯在東大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教授歐洲的現代史學研究方法，使日本人能將其應用於本國史的研究。1889年6月，東大創立以日本史為主的「國史科」。國史科成立之前，東大校長渡邊洪基(1848–1901)曾徵詢里斯的專業建議。里斯在1888年11月30日提出一份書面的建議，內容涵蓋課程設計、歐洲語言的要求、歷史輔助科學的訓練等。值得注意的是，里斯指出了海外涉日檔案的重要性。他在建議書的結尾特別提到荷蘭海牙檔案館(Rijksarchief, Den

<sup>31</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6r–6v.

<sup>32</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7r–7v. 布瑟為德國哲學家，曾是里斯在東大的同事。1887年至1893年間他在東大教哲學、認識論、倫理學、美學、歷史哲學等課程，1894年返回德國，曾在馬堡等多所德國大學任教。

Haag)所藏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建議校長推動在海牙檔案館的抄寫工作，特別是其中與平戶、出島荷蘭商館有關的檔案、書信與日記等文件。里斯認為這些檔案是日本史的珍貴史料。<sup>33</sup>

里斯剛到日本便有研究該國歷史的想法。在前述的信裡，里斯提到自己打算開設一門以某個日本歷史事件為主題的專題研究課，<sup>34</sup>此課程以 1637–1638 年間發生的島原之亂為主題，其研究成果在 1891 年發表於《德國東亞研究協會期刊》(*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in Tokio*)。<sup>35</sup>在這篇論文的最後，里斯提到此文採用東大臨時編年史編纂掛(編纂部)的重野安繹(1827–1910)在九州收集的史料。後者將這些史料提供給里斯，並讓兩位史學科的學生為里斯翻譯這些史料，而史料考證的內容則來自於里斯在專題研究課上與學生共同工作的成果。<sup>36</sup>之後里斯的東亞史研究著作大多採用類似的模式進行：因為里斯日語能力有限，因此他必須依賴既有的西文翻譯或是請日本學生為他翻譯所需的日文史料，而他本人則積極開拓西文的史料，特別是海牙國家檔案館所藏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里斯除了在

<sup>33</sup> 《東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上冊》(東京：東京帝国大学，1932)，頁 1299–1303。

<sup>34</sup> SBB PK Nl.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8r–8v.

<sup>35</sup> Ludwig Riess, “Der Aufstand von Shimabara, 1637–1638. Nebs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benutzten Quellen,”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in Tokio* 5:45 (1891), 191–214. 島原之亂是 1637 至 1638 年發生在九州島原與天草地區的民變。在 16 世紀末期與 17 世紀初期，天主教傳教士在這些地區相當活躍，導致許多民眾成為基督徒。事件起因於當地大名對民眾課徵重稅，引發民眾反抗。反叛的民眾佔領原城，與征討他們的幕府軍對峙。經過幾個月圍城後，幕府軍攻破原城，大量處決反叛者與當地民眾。此後德川幕府更排斥外國勢力，導致葡萄牙人被驅離日本，而日本的基督徒也被迫轉入地下活動。

<sup>36</sup> Riess, “Der Aufstand von Shimabara, 1637–1638. Nebs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benutzten Quellen,” 214.

1888年建議渡邊校長推動在該館的文獻抄寫工作之外，更在1893年返德休假期間前往荷蘭、倫敦與羅馬等地的檔案館，以收集與日本有關的資料。<sup>37</sup>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里斯因此對臺灣產生興趣，隔年他在《史學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介紹海牙檔案館內的日本相關文件，並在文末強調荷蘭所藏的臺灣相關文獻。<sup>38</sup>里斯在1897年的《德國東亞研究協會期刊》發表長文〈福爾摩沙島史〉（“Die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此作為第一部受現代專業史學訓練者所撰寫的通史性質臺灣史著作，可以說是西方專業史學研究臺灣史的開端。<sup>39</sup>

里斯剛到東大任教時，仍不忘情於原本的研究領域。他在1887年的信裡對戴布呂克提到，自己當時打算利用休假的時間完成一篇投給德國《史學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稿件，但也說之後再也沒有辦法從事類似的新研究了，一來是因為日本缺乏所需的參考文獻，二來在日本能花費在研究上的時間遠少於德國，他曾在信裡抱怨這裡有太多必須出席和參訪的公開活動，這些工作花去太多時間。<sup>40</sup>日本的工作讓里斯難以繼續研究歐洲史，倘若他未曾前往日本，而是一直留在德國發展，基於當時學術領域高度分化的現象，他很可能直到退休都會以英國史或歐洲中古史為研究範圍。相較之下，此時日本的專業史學尚在起步階段，不僅缺乏專業的史學師資與合適的世界史教材，而且許多學生還不太熟悉西方文化裡的一些基本概念。除此之外，學生更必須習慣以外語授課的外籍教師。

37 金井圓，〈ルトウイヒ・リース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頁1451。

38 ルッドキツヒ・リース(Ludwig Riess)，〈和蘭國ヘーグ市ニ於ル日本歴史ニ關スル古文書〉，《史學雜誌》，7：6(東京，1896)，頁458-460。

39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頁164。

40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10r-10v. 里斯在此所提到的稿件是 Ludwig Riess, “Der Ursprung des englischen Unterhause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60:1 (1888): 1-33.

里斯在東大用英語講課，根據當年學生幸田成友(1873–1954)回憶，里斯講話時帶有濃厚德語口音，他剛開口說話時會有些口吃，但之後就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吐出大量內容。<sup>41</sup>幸田指出，他在當時已經學過七、八年的英文，但用來應付里斯的課程仍非常勉強，除了像村上直次郎(1868–1966)等外語能力較強的學生之外，里斯的課對大部分日本學生來說是很大的挑戰。<sup>42</sup>而村上也在一篇簡短的回憶錄中提到，里斯的英語一開始難以理解，直到習慣他的講話方式後才比較進入狀況。<sup>43</sup>

在幸田成友的回憶裡，他提到里斯會為修世界史課程的學生編寫講義，以應付學習和考試的需求。里斯會將編好的講義送到秀英舍排版印刷。<sup>44</sup>他提到有時考試日期已經迫近，但最新課程進度的講義還未完成印刷，他只好去里斯的宿舍借講義的草稿。<sup>45</sup>由此可見里斯編寫的講義對學生非常重要。幸田更指出，當他借到里斯的講義草稿時，發現這些紙張的大小材質不一，且充滿無數塗抹修改的痕跡，便體悟到，里斯寫完講稿後應該會邊背誦邊修改，這大概是他在講課時從不需看稿的原因。<sup>46</sup>

在 19 世紀的德國大學演講課上(Vorlesung)，教授對學生呈現自己的研究，而學生必須費心整理課堂筆記以應付考試，因此至今許多德國

---

41 幸田成友，《凡人の半生》(東京：共立書房，1948)，頁 156。

42 幸田成友，《凡人の半生》，頁 156。

43 村上直次郎，〈思い出話〉，收入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会編，《キリシタン研究：第 12 輯》(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頁 38。

44 秀英舍為 1876 年在東京創立的印刷公司，它在 1935 年與日清印刷合併，並更名為大日本印刷。並非所有里斯在東大編寫的講義都由秀英舍印刷，某些是在富山房。

45 幸田成友，《凡人の半生》，頁 158。

46 幸田成友，《凡人の半生》，頁 158。里斯常強調記憶力的重要性。幸田提過里斯曾在課堂上教訓他：「遺忘是史家的一大弱點。」(頁 157)

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仍藏有大量 19 世紀裝訂成冊的課堂筆記。當時大學生所寫的課堂筆記主要分成兩類：其中一類被稱為 *Mitschrift*，是學生上課時抄寫教授講課內容的產物，性質類似演講的逐字稿，往往被視為被動吸收的知識，因而評價較低；另一類被稱為 *Nachschrift*，是以學生隨堂聽寫的內容或聽課的記憶為基礎，課後再用自己的話寫下課堂內容，有些學生甚至會在筆記裡加入教授在課堂上提過的文獻內容，這類的筆記被視為學生主動吸收理解，並灌注自己精神智力所生產的成果。<sup>47</sup>里斯親自為學生編印內容完整的課堂講義，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德國大學較為少見。

我們可以說，里斯編寫的課堂講義是特殊時空環境下的產物。里斯在日本以英文授課，但缺乏合適的英語教本，且許多學生的英語聽力不佳，而里斯帶有口音的英文又讓學生更難理解。基於這些因素，為學生編寫英文的講義確實是合適的辦法。從里斯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抵達日本的第一年就有為學生編講義的念頭。以世界史為例，他提到當時日本流行兩種英美作家所寫的世界史課本，但他仍認為自己有義務為學生撰寫一部世界史教材，藉此展示不同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如何產生連結，並提供一個統一的世界史觀點。<sup>48</sup>

如前所述，德國大學生的課程筆記可以展現出學生的主動吸收能力，甚至被視為學生動用理解力和智力所產出的成果。相較之下，里斯將講課的內容印成紙本講義發送給學生，讓學生作為課堂上和準備考試時的輔助。里斯在信裡將這些講義稱為“*Diktat*”，原意是口授的紀錄。從里斯的信裡可以看出，他的學生相當依賴這些講義資料。但這並不完全符合里斯的期望，他觀察到這些學生「精確地背誦我說過

47 Holger Dainat, “Mitschrift, Nachschrift, Referat, Korreferat,”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40:2 (Januar 2015): 315–317.

48 SBB PK Nl.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11r.

的話或講義裡的內容；但這幾乎只是純粹的記憶活動，不包含更高階的感受或是任何一種對文字內涵的想像」。<sup>49</sup>而這些學生儘管用功，但在里斯眼裡他們就像「女子學校的女孩們，上進且好學，但缺乏真正的精神自由」。<sup>50</sup>在《日本雜記》收錄的一篇文章裡，里斯更清楚地指出他認為日本文化發展中的缺陷在缺乏個人特色與自我實現，也就是個體性與個人性格受到極為嚴重的壓抑。<sup>51</sup>

里斯認為日本人對個體性的壓抑是他們「缺乏精神自由」的原因，也因此日本學生只善於背誦史實。里斯想要強調的是，學習歷史不只是背誦資料，更重要的是能看出不同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貫穿在事件背後的整體脈絡。就此而言，里斯心目中的理想典範是蘭克：

從關於某一個民族的大量事件之中，他(蘭克)挑出那些影響了其他事物的事件，好讓這諸多事件形成一個活生生的群體。在這類事件所組成的整體之中，他希望能理解這一個民族的共同體如何發展為目前的樣貌。<sup>52</sup>

由此可見，里斯為東大學生編寫講義，但他希望學生不要只會背誦其中的史實和因果關係的解釋，而是期盼他們能從課程中自己思考和理解世界史發展的重要脈絡。里斯對自己在日本的工作具有強大的企圖心，他希望推動日本史學的專業化和現代化。在 1887 年 6 月的信中，他提到不同國籍的外籍教師間的競爭意識。<sup>53</sup>里斯感到英國人企圖獨佔向日本人引介西方文化的權利，但他更認為德國人才是最適合教導

49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s. 13v–14r.

50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14r.

51 Ludwig Riess, *Allerlei aus Japan*, vol. 1, 96–97.

52 Ludwig Riess, *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Bein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vol. 1 (Tokyo: Fusambō, 1899), 6.

53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s. 8v–9v.

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教師。他在同一封信裡主張：

日本對[西方]現代文化的關係很像[歐洲]中世紀對古代文化的關係：必須在過於豐富的寶藏裡做出挑選，以免它們因為不可能做到的全面推廣和保存而遺失。我們必須做好摘要、提取其精華。英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媒介，正如拉丁文在中世紀的地位，在此地的英國人已做了必要的工作，特別是編寫了合適的手冊。但這個工作需要系統性的思想和靈活的思考力，這是他們特別缺乏的。德國人在這方面是最適合的人選，我們得試圖在理論性的科目證明這一點。<sup>54</sup>

從前述的主張可以看出，里斯對於自己在日本的工作抱有強烈的使命感，也因此非常認真看待自己為學生所編撰的講義。1896年里斯與東大第三次續約，在決定續約之前，他在1895年的年底寫信給戴布呂克，表達他自己對於續約的猶豫。他希望在英國找一份檔案館館員的工作，但也想完成為日本學生編寫的課程講義，以藉此「在日本留下一份美好的紀念品」。<sup>55</sup>由此可以看出，編寫講義應該是他決定繼續留在日本的原因之一。里斯在東大講授的課程中，對他自己未來發展影響最大的當是世界史和史學方法課程。如之前所述，里斯認為德國人比英國人更善於作理論性的整理，我們可以說，藉由編寫這類課程的講義，里斯不僅用有系統的方式帶領日本學生了解歷史理論和世界史的發展，更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造屬於自己的整體世界史觀點和一套歷史知識理論體系。

當里斯在1887年初抵達日本時，該國還沒有在歐洲受過現代專業史學訓練的學者，因此必須以高薪聘請里斯這位外籍專家赴日教

<sup>54</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11v.

<sup>55</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28v.

書，但日本同時也積極資助本國人才至海外學習。到了 1890 年代初期，赴歐留學的日本歷史學者陸續返國任教，例如坪井久馬三在 1887 年赴歐，在柏林、布拉格、維也納與蘇黎世等地留學，1891 年返回東大任教；<sup>56</sup>而另一位留學歐洲的日本史家箕作元八則在 1891 年獲得德國杜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的學位，隔年返回日本，任教於高等師範。<sup>57</sup>在這些日本學者返國之後，里斯便不再是難以取代的專業人才了，也因此東大在 1902 年便不再與里斯續約，而他在東大的繼任者正是箕作元八。

里斯在東大講授的大部分課程都不採用既有的教本，而是親自撰寫課程講義，尤其是在世界史與史學方法論的課程講義琢磨甚深。<sup>58</sup>里斯返德十年之後，在 1912 年發表專書《歷史知識理論：一個歷史思考與研究的工具》，這是一部以東大《史學方法論講義》為基礎所發展的作品。從這兩部作品可看出里斯史學理論的內容與發展。

#### 四、從《史學方法論講義》到《歷史知識理論》的發展

就向日本人傳播西方現代文化的工作而言，里斯認為德國人在系統性和理論性的層面佔有優勢。身為受日本政府聘雇的歷史學專家，他必然將史學方法論課程視為他在東京教學工作的重點。

里斯在東大編寫的《史學方法論講義》有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

56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 140。

57 金井圓，《お雇い外国人》，頁 144。

58 相較之下，曾在 1893 年代替休假的里斯開設史學方法論課程的坪井久馬三便採用德國史家伯倫漢(Ernst Bernheim)的《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作為教本。參見幸田成友，《凡人の半生》，頁 153-154。

沒有專門的書名頁，完成的時間大約在 1892 與 1893 年之間。第一頁上方印著課程名稱“Methodology of History”，接著便是導論的內文。這個版本的講義沒有印上作者、年份和其他的出版資訊(參見附圖 1)。<sup>59</sup>里斯在 1892 年 5 月 5 日寫給戴布呂克的書信中首次提到自己的史學方法論講義，更說：「我最大的野心是在這個世紀結束前將其出版。」<sup>60</sup>在這封信裡。里斯提到講義中的初級方法論已經完成，而其他部分則仍在醞釀當中。我們可以推斷第一版的史學方法論講義應該在 1892 年的下半年或 1893 年完成。在第一版的講義裡，除了開頭的導論之外，內容主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初級方法論」(elementary methodology)，也就是里斯信裡提到已完成的部分，第二部分是「高級方法論」(higher methodology)，這應可對應於里斯信裡提到的「其他部分」。<sup>61</sup>

在 1895 年 12 月 4 日寫給戴布呂克的信裡，里斯表明他希望修改史學方法論的講義，並將其完成。<sup>62</sup>隨後第二版的講義在 1896 年出版，在章節安排和內容結構上與第一版沒有太大的差別。不同的是，第二版有專屬的書名頁，其上印有書名、作者姓名、版本號碼，以及出版地和年份等資訊，外觀更接近正式出版的書籍(參見附圖 2)。<sup>63</sup>另外，這個版本增加了更多內容、參考書目，也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版的書名頁上提到此書只是整部作品的「第一部分」。兩個版本的導論裡都提到高級方法論裡最後一章的主題是「歷

---

<sup>59</sup> Ludwig 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ed.] ([Tokio?]: [s.n.], [c.1892–1893]).

<sup>60</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21r–21v.

<sup>61</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21r–21v.

<sup>62</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28r.

<sup>63</sup> Ludwig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Tokyo: [s.n.], 1896).

史哲學」，<sup>64</sup>但實際上兩個版本的講義都沒有討論歷史哲學的專章。

在 1901 年 12 月 8 日，里斯寫給戴布呂克的信裡回顧自己在日本 15 年的工作，並提到他打算寫一部史學方法論的大作：

我此刻正在寫的這本書已經完成大約 10 印張的清稿紙，此書包含了我的思想和工作的精華。這是一個用百科全書和史學方法論為框架的、對歷史現象的系統性綜述。……這整部作品可視為 15 年來我在此地教學的觀念收穫。這裡的環境適合我喜好沈思的傾向，如果我沒有待過這裡的話，我不敢想自己竟然有辦法掌握如此龐大的素材。<sup>65</sup>

此作靈感應來自於里斯在柏林大學的老師朵伊森。里斯向柏林大學繳交的博士論文附有一份簡短的拉丁文自傳，其中提到三位影響他最深的大學老師，而朵伊森正是其中一位。<sup>66</sup>里斯在信裡提到他想要撰寫的著作是「用歷史百科全書學和史學方法論為框架的，對歷史現象的系統性綜述」，而這樣的敘述正來自朵伊森講授的課程「歷史百科全書學與方法論」(Historische Encyc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sup>67</sup>里斯在 1881 年夏

---

<sup>64</sup> Ludwig 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ed.], 19; Ludwig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Tokyo: [s.n.], 1896), 20.

<sup>65</sup> SBB PK Nl.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s. 47v–48r.

<sup>66</sup> HU UA, Phil.Fak.01.Prom., Nr. 265, fol. 288v. 另外兩位是戴布呂克和布勒斯勞。

<sup>67</sup> 朵伊森自 1857 年起在耶拿大學(Universität Jena)首次講授此課程，此後這成為他固定開設的課程，在 1859 年他轉至柏林大學任教後依舊如此，最後一次授課是在 1882 / 83 年的冬季學期(朵伊森在 1884 年過世)。在這二十多年的期間，這門課朵伊森總共講了 17 次，但使用的課程名稱偶有變化。參見 Horst Walter Blanke, "Das Lebensthema: Die Historik im Verlauf von Droysens Lehr- und Publikationstätigkeit - ein werkbiographisches Nachwort," in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Historische-Kritische Ausgabe*, Bd. 3,2: Die "Historik"-Vorlesungen »letzter Hand«: Textvarianten,

季學期修過這門課程。<sup>68</sup>此外，朵伊森曾為了修這門課的學生編印一份名為《歷史知識理論大綱》(*Grundriss der Historik*)的小冊。<sup>69</sup>

里斯在 1912 年出版新書《歷史知識理論：一個歷史思考與研究的工具》，正是他在前引 1901 年信件裡所提寫作計畫的成果。此書的主標題「歷史知識理論」明顯受到朵伊森的影響，而副標題則來自朵伊森在《歷史知識理論大綱》裡所說的：「它(歷史知識理論)的任務是建立一個歷史思考與研究的工具。」<sup>70</sup>

除此之外，里斯的《史學方法論講義》和《歷史知識理論》在結構上都與朵伊森的《歷史知識理論大綱》有若干相似之處。為了便於就這三部作品的結構與內容進行進一步的討論與比較，筆者將它們的目錄大綱以並排的方式條列如下：<sup>71</sup>

---

editorischer Bericht und werkbiographisches Nachwort, ed. Horst Walter Blank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2020), 783–784.

<sup>68</sup> 西川洋一，〈ベルリン国立図書館所蔵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書簡について〉，頁 426。

<sup>69</sup> 如書名所示，這是一個大綱性質的作品，內容相當精簡和抽象，未聽朵伊森講課者難以理解其內容。這份小冊最初只是為聽課學生編印的講義性質稿件，朵伊森在 1868 年將其正式出版，之後分別在 1875 年與 1882 年發行第二版與第三版。第三版大綱的內容與前兩版差異較大，對應的是 1879 至 1883 年間歷史知識理論課程的內容。里斯在東大史學方法論的講義裡也將這份小冊列入參考書目。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ed.], 19.

<sup>70</sup>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3. umgearb. Aufl. (Leipzig: Veit & Comp., 1882), 12，引文裡的底線為筆者所加。里斯在自己的《歷史知識理論》裡也強調朵伊森的這句話是一個「有力的宣示」：Riess, *Historik*, XI.

<sup>71</sup> 表內對本文討論較為重要部分列出章(以大寫羅馬數字表示)以下之細目，其他部分皆列至章的層級為止。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大綱》目錄條目的中文翻譯大致參考胡昌智的中譯本：朵伊森著，胡昌智譯，《歷史知識的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內容分類	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大綱》(第三版，1882)	里斯，《史學方法論課程講義：第一部分》(第二版，1896)	里斯，《歷史知識理論》(1912)
導論	導論 I. 歷史 II. 史學方法 III. 歷史知識理論的任務	導論 § 1. 歷史的科學性質 § 2. 最單純的歷史事實與認識它們的可能性 § 3. 對歷史資料確定性的懷疑論點 § 我們主題的範圍與細分	<b>第一卷</b> 第一篇：史學的原則 I. 歷史性觀察的概念 II. 提出歷史性的問題 III. 歷史的觀點與意圖的領域 IV. 歷史意義 V. 論史學的邊緣領域與現代的歷史地理學與民族學 VI. 史學與社會學
方法論	第一部分：方法論 I. 提出問題與尋找資料 II. 考證 III. 詮釋 a) 實用性的詮釋 b) 條件的詮釋 c) 心理學的詮釋 d) 理念的詮釋	<b>初級方法論</b> I. 形塑問題 II. 尋找資料 III. 歷史考證 IV. 歷史詮釋	(沒有與前兩作相對應的方法論章節)
系統論：個人	第二部分：系統論 I. 歷史活動中的素材 a) 自然界的事物 b) 作為生物的人 c) 人類創造的成果 d) 人的目標、企盼與熱情	<b>高級方法論</b> V. 歷史現象的系統性考察 § 1. 導論 § 2. 人的不同氣質 § 3. 個人的體格 § 4. 情緒與情感 § 5. 智性能力 § 6. 審美興趣 § 7. 宗教的激情 § 8. 倫理的品質 § 9. 性格 § 10. 理智	<b>系統性部分</b> 第二篇：歷史現實中個人生活的類型 I. 心理學現象與歷史寫作 II. 開朗或消沉的天性 III. 四種氣質 IV. 身體與靈魂相互作用的跡象 V. 情感與熱情的跡象 VI. 記憶、幻想與審美興趣 VII. 智力的天份 VIII. 宗教性的精神發展 IX. 道德舉止與理智 X. 性格 XI. 人格

內容分類	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大綱》(第三版，1882)	里斯，《史學方法論課程講義：第一部分》(第二版，1896)	里斯，《歷史知識理論》(1912)
系統論：群體	II. 歷史活動中的組織 A. 因天性而造成的類聚 a) 家庭 b) 鄰居 c) 氏族 d) 民族 B. 因理想而造成的類聚 a) 語言行為及語言 b) 美與藝術 c) 真理與科學 d) 聖與宗教 C. 因實用而造成的類聚 a) 社會的範圍 b) 社會福利的範圍 c) 法律的範圍 d) 權力的範圍 III. 歷史活動中的工作者 IV. 歷史活動中的目的	§ 11. 人類群體(包含自由的與建制的群體) § 12. 自由的人類群體 § 13. 建制的人類群體 § 14. 自然的聯合(家庭、家族、氏族、部族、民族) § 15. 產業的聯合 § 15. 經濟的聯合(僅有構想，此處編號重複) § 16. 社會的聯合(僅有構想) § 17. 宗教的聯合(僅有構想) § 18. 理念的聯合(僅有構想) § 19. 政治的聯合(僅有構想)	第三篇：歷史現象的系統概覽 (第二部分：自由的人類聯合) I. 因個人好感與反感而建立的群體 II. 奠基於社會形式的自由群體 III. 奠基於理念追求的自由群體 IV. 時尚與時代精神 V. 透過「歷史理念」而凝聚的自由群體 附錄：〈論德文字尾“-schaft”)〉 <b>第二卷(僅有構想)</b> 第四篇：有組織的人類共同體(僅有構想) 第五篇：作為歷史進程產物的積累(僅有構想)
體裁論	第三部分：體裁論	VI. 體裁論	(無專門的體裁論章節)
其他	附錄：〈提升歷史成為一門科學〉、〈自然與歷史〉、〈藝術與方法〉	VII. 歷史哲學(僅有構想)	結論：歷史哲學的任務(僅有構想)

在里斯修過的朵伊森的歷史知識理論課程中，朵伊森將導論以外的內容分成「方法論」(Methodik)、「系統論」(Systematik)與「體裁論」(Topik)三大部分。「方法論」討論歷史研究的方法，包含「提出問題與尋找資料」(Heuristik)、「考證」(Kritik)與「詮釋」(Interpretation)等三章；「系統論」討論歷史研究的對象；「體裁論」則討論研究結果的呈現方式。最後一版《歷史知識理論大綱》(1882年第三版)的內容結構也是如此。<sup>72</sup>里斯在東大編寫的史學方法論講義在結構上相當接近朵伊森，「初級方法論」裡包含的四章與朵伊森的「方法論」相當類似，而「高級方法論」裡的第五章「歷史現象的系統性考察」及第六章「體裁論」則對應於朵伊森的「系統論」與「體裁論」。

里斯在1912年出版的《歷史知識理論》則不論是架構還是內容，相較前述兩書都展現出很大的差異。首先，此書第一篇「史學的原則」的性質接近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和里斯史學方法論講義中的「導論」，但里斯在1912年的著作裡將這個導論性質的部分大幅擴充，以至於佔了全書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至於佔了另外四分之三篇幅的「系統性部分」，則對應於里斯東大史學方法論講義第五章「歷史現象的系統性考察」，以及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的「系統論」。里斯原本打算以兩卷的篇幅寫作《歷史知識理論》，1912年出版的只是第一卷，構想中的第二卷則未實現。儘管如此，從里斯在第一卷裡對第二卷內容的概述，可以得知第二卷內容仍以「系統性部分」為主，而最末的結論部分則預計以歷史哲學為主題。<sup>73</sup>

若將里斯構想中的《歷史知識理論》全貌與他東大時期的《史學方

<sup>72</sup> 在較早的版本(1857年的歷史知識理論課程與1862年第一版及1875年第二版的《歷史知識理論大綱》)中，「體裁論」並不自成一個獨立的部分，對應的內容出現在「方法論」下的第四章：「呈現」(Darstellung / Apodeixis)。

<sup>73</sup> Riess, *Historik*, 99.

法論講義》相互比較，可看出系統論是兩部作品間最具有延續性的部分。在《史學方法論講義》第五章「歷史現象的系統性考察」裡，§2 至 §10 著重於個人心理學的探討，對應於《歷史知識理論》的「第二篇：歷史現實中個人生活的類型」；前者第五章自§11 起開始探討人類群體，其中「§12. 自由的人類群體」在後者中大幅擴充為「第三篇：歷史現象的系統概覽(第二部分：自由的人類聯合)」，而前者第五章自§13 至最後一條則討論「建制的人類群體」，且除了§13、§14 與§15 之外，大部分的條目僅有標題而無內文，這部分可對應於《歷史知識理論》未成書的第二卷裡的「第四篇：有組織的人類共同體」。也就是說，里斯在日本尚未完成系統論中「建制的人類群體」部分，而 1912 年的《歷史知識理論》也依舊如此。至於在日本已經完成的系統論部分(也就是對個人的心理學探討與「自由的人類群體」)，在《歷史知識理論》裡則有大幅的增補與擴充。

東大時期的史學方法論講義在結構上仍接近朵伊森的歷史知識理論，後者的「方法論」、「系統論」與「體裁論」在前著中都有對應的部分，而且這三個主題在兩人的著作裡出現的先後順序也完全相同。但里斯回德國後撰寫的《歷史知識理論》(包含已出版的第一卷與構想中的第二卷)裡完全不含「方法論」和「體裁論」，<sup>74</sup>而「系統論」的部分則大幅擴增，由此可以看出里斯的史學理論架構已經脫離了朵伊森的影響。

在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大綱》出版後，19 世紀末歐洲最重要的兩部史學方法論著作是德國史家伯倫漢(Ernst Bernheim, 1850–1942)的《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1st ed. 1894)與法國史家朗格諾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 1863–1929)與色諾波斯(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合著的

74 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的第一篇「史學的原則」裡的第二章主題為「提出歷史性的問題」，這在朵伊森的理論中被劃入「方法論」的部分。儘管如此，里斯的《歷史知識理論》並不討論史學方法中較偏向技術性的範疇。

《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1st ed. 1897)。<sup>75</sup>前者曾被里斯列入他在東大編寫的第一版《史學方法論課程講義》裡，<sup>76</sup>但如前所述，里斯講義的結構相當接近朵伊森的《歷史知識理論大綱》，與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及朗格諾瓦與色諾波斯的《史學原論》都非常不同。後兩部著作都偏重在朵伊森歷史知識理論中的「方法論」面向，特別是與考證有關的部分，卻未專章討論朵伊森理論中的「系統論」面向。<sup>77</sup>而里斯在 1912 年出版的《歷史知識理論》卻特別偏重伯倫漢、朗格諾瓦與色諾波斯所忽視的「系統論」。

儘管里斯對日本史學現代化有重要的貢獻，但根據李孝遷與胡昌智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對東亞近代史學產生更大影響的其實是伯倫漢的著作。<sup>78</sup>此外，20 世紀初曾在德國留學的中國歷史學者，如傅斯年(1896–1950)、姚從吾(1894–1970)與張貴永(1908–1965)等人在方法論上其實皆受到伯倫漢的影響。李孝遷與胡昌智指出，傅斯年和姚從吾在北京大學主講的史學方法論課程都採用伯倫漢之說，而張貴永的史學方法著作也以伯倫漢為主要參考依據。<sup>79</sup>但李孝遷與胡昌智也強調，伯倫漢的史學理論具有實證主義的傾向，他否定史家的主體性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更曲解蘭克的史學理念。他們認為伯倫漢忽視蘭克思想中的唯心主義和宗教情懷，將蘭克曲解為只重視史料考證的的實證學者。<sup>80</sup>

<sup>75</sup> Riess, *Historik*, 23–24, 60–62, 370.

<sup>76</sup> 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ed.], 19.

<sup>77</sup> 關於朵伊森、伯倫漢、朗格諾瓦與色諾波斯史學理論的比較，可參見 Rolf Torstendahl. “Fact, Truth, and Text: The Quest for a Firm Basis for Historical Knowledge around 1900.” *History and Theory* 42:3 (2003): 305–331.

<sup>78</sup> 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頁 315–317。

<sup>79</sup> 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頁 322–323、330–331、337–338。

<sup>80</sup> 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頁 302–305。

由此可見，在 20 世紀初，東亞地區主要透過伯倫漢的著作來認識德國的歷史主義史學，也因此以蘭克為代表的德國史學常被誤解為只重視客觀性和史料考證的實證主義史學。里斯對於蘭克的認識更為全面，他批評將蘭克史學簡化為實證史學的觀點，指出蘭克對檔案的強調有其歷史背景，更認為歷史研究不僅是史料的收集、考證和詮釋而已。他在《歷史知識理論》裡提到：

一旦檔案館員和編輯盡了他們的義務之後，這些「資料」的收集、考證和詮釋通常就只是基礎的簡單工作。蘭克要德國史學透過檔案來研究近幾個世紀的歷史，如果理解正確的話，這個野心的用意主要是與舊的史學研究相比，強調我們現在的義務是，藉由對外開放的檔案來驗證我們的歷史知識。可惜的是，較新的知名史學方法論教本都採取不恰當的立場，以為當代專業史家的著作完全建立在散落於多國檔案館中的真實檔案，和精密考證編輯過的史料集之上。<sup>81</sup>

里斯在這段話裡提到的史學方法論教本，就是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和朗格諾瓦與色諾波斯的《史學原論》。<sup>82</sup>對里斯而言，如果單方面強調史料的重要性，歷史學將難以捍衛自身學科的獨立性，一來是隨著愈來愈多史料集的編輯出版，史料的取得變得愈來愈容易；二來是解讀史料主要依賴理性思維和一般常識，這些都不是歷史學獨有的技能。事實上，羅馬史學者蒙森在 1874 年 10 月 15 日柏林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已經點出這個危機。蒙森指出，歷史學者所做的只不過是處理事實的經過、將其串連起來，並用敘述的方式加以呈現而已。而這些工作是任何一個有思考能力的人做得到的。<sup>83</sup>因此他認為：「如果

<sup>81</sup> Riess, *Historik*, 23–24.

<sup>82</sup> Riess, *Historik*, 23–24, 60–62, 370.

<sup>83</sup> Theodor Mommsen, “Rede bei Antritt des Rektorates,” in Theodor Mommsen,

將史學研究本身，也就是大學裡以史料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放在主要地位的話，這會是一種錯誤。」<sup>84</sup>他甚至強調：

傳聞的見證者的份量取決於消息來源者的可信度，這可以說是史料研究的唯一原則。而卓越史家在下判斷時所展現的神秘直覺式的準確，在十個案例裡有九個都只是無意識地將這個原則應用在複雜的問題之上。<sup>85</sup>

由此可見，蒙森認為歷史學處理的是用一般常識就可以掌握的資料，它沒有專屬的方法和訓練，好的歷史學者擁有一種直覺式的天份，而這是無法透過學習和訓練所培養的。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裡強烈批評蒙森的上述觀點，強調：

「歷史知識理論」的任務正是在於，透過分析適當的範例，讓這些「複雜的問題」變得更有條理，並且，只要是和「原則的應用」有關的話，使其清楚明白，好讓「無意識」消失無蹤。<sup>86</sup>

里斯認為前述問題的根源，在於至今的史家在史學方法論上將「意識資料」(Bewusstseinsmaterial)與「證據資料」(Beweismaterial)相互混淆。里斯強調「意識資料」是真正屬於歷史學的資料，它是「活在人類腦中，或是以可讀方式記錄的，與事件有關的記憶或形象」，<sup>87</sup>而援引「證據資料」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爭議論點和填補歷史空白，且大部分的證據資料是歷史學和其他學科都會使用的。<sup>88</sup>里斯強調，許多人將證據資料視為史學獨有，而這樣的觀點正是現有史學方法論著作受到鄙視

---

*Rede und Aufsätze* (Berlin: Weidemann, 1905), 3–16. Here 10.

<sup>84</sup> Mommsen, “Rede bei Antritt des Rektorates,” 11.

<sup>85</sup> Mommsen, “Rede bei Antritt des Rektorates,” 11. 引文中的底線為筆者所加。

<sup>86</sup> Riess, *Historik*, 23.

<sup>87</sup> Riess, *Historik*, 23.

<sup>88</sup> Riess, *Historik*, 23.

的罪魁禍首。<sup>89</sup>

蒙森認為優秀史家會無意識展現直覺式的天份，但里斯相信，這些神秘而無意識的天份其實是可以分析的方式說明的，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在史家對人類心理的認識，而這部分正與里斯所謂的「意識資料」，也就是歷史學所獨有的資料，有極大的關係。正因如此，里斯相當重視對人物心理的分析，他在《歷史知識理論》的「系統論」花費極大的篇幅討論與性格和心理有關的主題。

「系統論」討論歷史研究的對象，在《歷史知識理論》的前言裡，里斯引述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著作〈論史家的任務〉中的段落：

現實感(Sinn für die Wirklichkeit)是歷史運動的要素，它讓人感受到事物在時間中的流逝，以及往事和伴隨因素所造成的約束，相對的是對內在精神自由的意識，以及理智的體悟：了解到即便現實世界在表面上充滿偶然，但實際上是受到內在的必然性所約制的。<sup>90</sup>

由此可見，里斯認為史家的任務是掌握世界史紛雜表象之下的內在關聯，而這項任務無法單純依賴史料考證等技術性手段掌握，更必須對歷史研究的所有對象做整體的探索，這應該就是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裡用最大篇幅討論系統論的緣故。里斯與他的老師朵伊森都非常重視史學理論裡的系統論，這也是他們與伯倫漢、朗格諾瓦及色諾波斯最大的不同之處。儘管如此，里斯與朵伊森的系統論內容有頗大的差異，而這正是里斯史學理論中最獨特的部分，以下將進一步探討。

<sup>89</sup> Riess, *Historik*, 23.

<sup>90</sup> Riess, *Historik*, XI. 里斯在此引述洪堡著作之全文見於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in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ed. Andreas Flitner and Klaus Giel.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5 Bänden 1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60), 585–606.

## 五、里斯的系統論和他與上一代史家的理論性對話

朵伊森是首位以系統化的方式，將史學研究的認知過程區分為「提問與尋找資料」、「考證」與「詮釋」等三大步驟的歷史學者。<sup>91</sup>朵伊森藉此為史學提供了一套自己的學術性研究方法，讓史學具有成為獨立學科的理論基礎。朵伊森認為人類有三種學術性的思考方式，分別是神學或哲學的玄思式 (speculativ)、物理學式 (physikalisch) 與歷史式 (historisch)，而這三種學術思考方式的本质各自是「認知」(erkennen)、「解釋」(erklären) 與「理解」(verstehen)。<sup>92</sup>關於歷史式思考的「理解」，朵伊森強調這並不是一種邏輯的機制，而是一種「直接的直覺，如同創造性的行動，如同兩個帶電體之間的火花，如同受孕的過程」。<sup>93</sup>更強調「理解是人類本質裡最人性的行為，人類所有的現實行為都以理解為基礎，都尋求理解，都找到理解。理解是人與人之間最緊密的紐帶，以及一切倫理存在的基礎」。<sup>94</sup>朵伊森認為理解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它可以掌握遙遠過去的人的想望、作為與成就，而史家的任務就是「以研究的方式理解」(forschend zu verstehen)。<sup>95</sup>

既然理解是史家的工作，而根據朵伊森對理解的定義，史家在理解的過程也扮演主動的角色，而非純粹被動地複製被理解的對象，那麼史料就不可能自己說話。史家在搜集史料並進行考證之後，仍須運用「理解」的能力找出史料的意義，這個過程就是詮釋。朵伊森藉此

---

91 Friedrich Jaeger and 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C.H. Beck, 1992), 59–60.

92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11.

93 Droysen, *Historik*, Bd. 3,1, 42.

94 Droysen, *Historik*, Bd. 3,1, 42.

95 Droysen, *Historik*, Bd. 3,1, 42.

為歷史思考提供了一套學術性的操作方式，一方面史家的研究必須以史料為基礎，另一方面歷史的研究工作並不僅止於史料的收集和考證，在這兩個步驟之後還必須用理解的方式詮釋史料。理解並不是一種機械性、複製性的認知過程，史家必須以神入的方式掌握史料的意義，而在理解的過程中史家的主體性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史學研究既是一個必須遵守嚴謹方法和學術規範的工作，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工作。因此朵伊森完全否定史料實證主義(Quellenpositivismus)，也就是否定將史料的收集和考證視為史學研究的一切。如前所述，里斯在 1912 年《歷史知識理論》的前言中宣示性地引述朵伊森將「以研究的方式理解」作為史家任務的說法，可見里斯相當服膺他的老師對歷史知識性質的觀點。

如筆者在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在朵伊森之後，大部分的史學理論著作偏重史學研究中技術性的方法層面(方法論)，但對於史學研究對象的性質與分類(系統論)卻未作深入討論。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和朗格諾瓦與色諾波斯的《史學原論》皆是如此，也因此歐洲史學專業化之後，特別自 19 世紀末開始，史料實證主義成為專業史學的代名詞。

就此而言，里斯在東大的史學方法論講義裡已有專門討論系統論的章節，在《歷史知識理論》第一卷裡，系統論的部分更佔了整卷大約 7 成的篇幅，而構想中的第二卷也仍是以系統論的內容為主。此外，在系統論的部分，里斯展現了更大的原創性，其內容結構與朵伊森的系統論完全不同。

里斯史學理論裡，系統論部分的最重要特色是對個人心理狀態的深入探討。相關討論主要出現在《史學方法論講義》第五章「歷史現象的系統性考察」(即系統論的前半部分(§1 至§10))，以及《歷史知識理論》裡第二篇「歷史現實中個人生活的類型」下的所有章節。以後者為例，里斯關注的個人心理特質包括「天性」(das Naturell)、「氣質」(das

Temperament)、「性格」(der Charakter)與「人格」(die Persönlichkeit)等。此外他也從身體與心靈的相互作用、審美興趣、宗教情操、道德意識等層面探討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筆者認為這正是里斯與朵伊森史學理論中差異最大的部分，為了凸顯里斯的特殊性，我們必須先了解朵伊森史學理論中對人物性格與個人特質的討論。

朵伊森認為人是一種兼具感官性和精神性的存在，也批評自然科學與人類學片面地強調人類動物性的一面。朵伊森強調自然科學無法解釋人的發展與變化，唯有透過歷史學研究，才能掌握人類發展的方向。<sup>96</sup>即便如此，朵伊森對於歷史人物的氣質、性格或人格等心理特質並未多加著墨。

事實上，在方法論的討論中，朵伊森提出四種詮釋的形式，而「心理學的詮釋」只是其中的一種。朵伊森指出：「心理學的詮釋是在史實中找出推動這個史實的意志行為。這種解釋方式可以從事實情況中辨識出引發它的意志行動。」<sup>97</sup>但朵伊森認為心理學的詮釋無法掌握歷史的全貌，認為它更適合用在文學創作之上：

像莎士比亞這類詩人用角色的性格來鋪陳事件的推展，他們的作品就是這個事件的心理學詮釋。但事實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人格以外的因素。事情就是會那樣發展，不管[其中的歷史人物]帶著善良或是邪惡的意志。<sup>98</sup>

朵伊森更諷刺地說：「如果把心理學的詮釋當作史家最主要的任務，那麼莎士比亞就成了最偉大的史家。」<sup>99</sup>由此可見，朵伊森認為心理學的詮釋無法理解歷史的全貌。進一步，他認為心理學詮釋的漏

<sup>96</sup> Droysen, *Historik*, Bd. 3,1, 316–319.

<sup>97</sup>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21.

<sup>98</sup>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21.

<sup>99</sup> Droysen, *Historik*, Bd. 3,1, 288.

洞則可藉由「理念的詮釋」(Interpretation der Ideen)彌補。<sup>100</sup> 朵伊森所謂的理念是歷史前進的過程中所蘊涵的思想，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有的主導理念，它們會刺激某些人物或民族，而歷史則藉此得以繼續前進。<sup>101</sup> 朵伊森認為歷史性的觀察方式，在於檢視歷史人物的行動是否符合時代的主導理念，至於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則不是他所關注的重點：

歷史性的觀察採用不同的視角；每一個個別事件的發生，在行動者眼中被視為目的的東西，對歷史來說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條件等，藉此重要的契機才能在變動之中出現。當亞歷山大征服亞洲時，他的目的不在於讓亞洲希臘化，也許他用這個政策來服務他那大膽而充滿野心的征服世界計畫；歷史則微笑著說：他的目的是滿足野心，但他的野心對我來說是將亞洲希臘化的工具。<sup>102</sup>

上述觀點顯示朵伊森的思想受到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歷史哲學的影響。黑格爾認為理性推動了世界史的發展，在此理性並非某一個別主體的理性，而是超越在歷史之上、屬於上帝的「絕對理性」(absolute Vernunft)。<sup>103</sup> 至於像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 100BCE–44BCE)這類歷史人物無法讓歷史隨自己的意志發展，他們的熱情與野心只是上帝或「絕對理性」將歷史往前推進的工具。黑格爾將此稱為「理性的詭計」(List der Vernunft)，<sup>104</sup> 朵伊森對亞歷山大的看法也是如此。黑格爾

<sup>100</sup>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23.

<sup>101</sup>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24.

<sup>102</sup> Droysen, *Historik*, Bd. 1, 342.

<sup>103</sup>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d. 1: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ed. Johannes Hoffmeister, 5th ed. (Hamburg: Meiner, 1955), 29.

<sup>104</sup>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d. 1: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105.

和朵伊森都相信歷史朝向一個最終的目的發展，兩人在此的差別是，前者認為自己可以闡明歷史發展的最終目的，後者則認為這個最終目的是人類無法以經驗手段確知的。<sup>105</sup>

與朵伊森相同，里斯也認為人類不可能找到支配整個世界史發展的終極目的，他更認為嘗試探索歷史終極目的會「窄化人類精神活動的可能性」，而這違背了人類自由的天性。<sup>106</sup>就「目的」的領域而言，里斯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人」的身上，他重視的是人的「目的意識」(Zweckbewusstsein)，也就是人的意圖，因為這是人類特有，無生物和動物則缺乏的東西。當史家在理解人世間無規律的變化時，「目的意識」是掌握事件整體面貌的關鍵。<sup>107</sup>在此里斯認為，目的是人類對某個原因會根據自然定律產生特定結果的預期想像，而這樣的想像會引發人的自發行動。因為人的自發行動包含無法預測的成分，所以帶有目的性的行動多少會造成一些自然定律之外的變化。<sup>108</sup>里斯主張這些不會重複發生的行動才屬於歷史研究的範圍，<sup>109</sup>因此他認為統計數字頂多只能提供量化指標，對於真正的歷史研究幫助並不大。<sup>110</sup>對此他諷刺地說：

就算真的有這樣一個無法動搖的律則存在：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每年必然會發生  $x$  起謀殺事件和  $y$  起自殺事件，但這無法用來解釋歷史事件，例如西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凱撒被殺，以及加圖在其兩年之前的自殺。因為如果我們說凱撒和加圖沒死的

---

<sup>105</sup>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35.

<sup>106</sup> Riess, *Historik*, 45.

<sup>107</sup> Riess, *Historik*, 40.

<sup>108</sup> Riess, *Historik*, 40.

<sup>109</sup> Riess, *Historik*, 42.

<sup>110</sup> Riess, *Historik*, 43.

話，那麼就無法滿足那兩個年份必要的統計數字，這根本算不上什麼解釋。<sup>111</sup>

里斯在此強調的是，從統計數字無法看出人的目的意識，因此無助於歷史解釋。儘管帶有目的意識的行動既無法預測，也無法找出發生的規律，但既然這才是歷史研究的對象，里斯還是試圖以系統化的方式來探究這個領域。里斯《歷史知識理論》的系統部分便以「整個目的的領域」(das ganze Reich der Zwecke)為研究的對象。<sup>112</sup>

在第二篇「歷史現實中個人生活的類型」，里斯以 10 章的篇幅探討人類心理的各個層面。為了避免過度的唯心主義傾向，里斯以靈魂(Seele)來指稱每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sup>113</sup>也以專章討論靈魂與肉體的相互作用。<sup>114</sup>里斯透過幾個層面來討論人物的心理特質，包括第二章探討個人的天性，這是一種兼具生物性與心理性的因素。里斯以生命力的感受(Vitalsinn)將人分為「開朗」(ευκολος)與「消沉」(δυσκολος)兩種天性，前者的意志與行動力較強，而後者則在面臨必須做出決斷的時候容易裹足不前。里斯指出，天性開朗的孩童在幼稚園的階段常因體罰而陷入了生命力感受的危機，也指出音樂可以克服消沉的天性。<sup>115</sup>第三章討論人的氣質，里斯在此根據人對外在事物感受力(Rezeptibilität)的速度與強度，以及反應力(Reagibilität)的強度與持久度，將人分成「黃膽液質」(choleric)、<sup>116</sup>「多血質」(sanguinisch)、<sup>116</sup>「黏液質」(phlegmatisch)與「黑膽液質」(melancholisch)等四種氣質。<sup>116</sup>其中黃膽液質的人容易對事情產

---

111 Riess, *Historik*, 43.

112 Riess, *Historik*, 93.

113 Riess, *Historik*, 101.

114 Riess, *Historik*, 103. 此部分詳細內容參見此書頁 119–128。

115 Riess, *Historik*, 107–112.

116 Riess, *Historik*, 115.

生爆發式的快速反應，且不容易恢復平靜。里斯認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和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屬於這種氣質的人物。多血質的人感受力極強且快，但反應力弱且短暫。如解放戰爭時期的名將布呂歇爾(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 1742–1819)，當其他將領在戰場犯了嚴重錯誤之後，他能很快地忘記前嫌，與對方繼續友好相處，里斯認為這就是多血質者的特色。黏液質的人感受力弱且慢，但反應力強而持久，綽號「拖延者」(Cunctator)的古羅馬名將費邊(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 280–203 BCE)是著名的代表人物。<sup>117</sup>

里斯更以 16 世紀日本戰國末期三位人物如何讓杜鵑啼叫的軼事來說明前述的三種氣質：織田信長(1534–1582)殺掉不啼叫的杜鵑，屬多血質；豐臣秀吉(1537–1598)誘導杜鵑啼叫，屬黃膽液質；德川家康(1543–1616)耐心等待杜鵑啼叫，屬黏液質。<sup>118</sup>至於第四種氣質，也就是黑膽液質，里斯認為這個詞彙(melancholisch)易使人誤解為心理上的病徵，因此建議以「無血質」(anämatisch)取代。這類人的感受力與反應力都弱，因此里斯認為歷史上鮮少重要人物屬於這種氣質。但里斯也指出，某些哲學家或宗教修行者可藉沉思壓抑自己的氣質，藉此達到令人尊敬的無血質狀態。<sup>119</sup>

里斯在東大的史學方法論講義裡已有對氣質的初步討論，但當時他將「開朗」與「消沉」也視為氣質的類型。<sup>120</sup>在《歷史知識理論》裡，里斯卻將這兩者排除在氣質類型之外，更指出將其他心理現象(包

---

<sup>117</sup> Riess, *Historik*, 116–117.

<sup>118</sup> Riess, *Historik*, 117–118.

<sup>119</sup> Riess, *Historik*, 118–119.

<sup>120</sup>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101–103.

括「開朗」、「消沉」)視為氣質類型是錯誤的做法。<sup>121</sup>由此可看出里斯在這部分的想法有所改變，而這樣的做法也可讓他更細緻地描述歷史人物的心理特質，例如他認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1740–1786 在位)屬於消沉天性的多血質氣質，而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 I, 1871–1888 在位)則屬消沉天性的黏液質氣質。<sup>122</sup>

里斯描述四種氣質的詞彙源自於古希臘醫學裡的體液論(humoral theory)。西元前 5 世紀的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c.460–c.370 BCE)相信人的體內有四種體液，也就是血液、黏液、黃膽液與黑膽液，這些體液的平衡不僅影響身體健康，對一個人的性格也有影響。舉例來說，黃膽液過剩的人脾氣暴躁易怒、黑膽液過剩的人意志消沉、黏液過剩的人感情遲鈍，而血液過剩的人性格活潑。<sup>123</sup>西元 2 世紀的羅馬醫師加倫(Claudius Galenus, 129–200)將體液論進一步發展和推廣，<sup>124</sup>從 17 世紀開始，隨著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體液論愈來愈受到質疑。<sup>125</sup>在今日，體液論裡的四種體液僅是用來比喻人的性格的詞彙。<sup>126</sup>由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裡對氣質的討論方式可以看出，他用這些源自於體液論的詞彙也僅是為了比喻人物的性格，與人的生理現象沒有直接關係。

里斯討論人物個人心理特質的詞彙，包括「開朗」與「消沉」兩種天性以及源自體液論的四種氣質，來自於 19 世紀德國哲學家班森(Julius Bahnsen, 1830–1881)的著作《性格學研究》(*Beiträge zur Charakterologie*)第一卷的

---

<sup>121</sup> Riess., *Historik*, 115.

<sup>122</sup> Riess., *Historik*, 116–117.

<sup>123</sup> Noga Arikha, *Passions and Tempers: A History of the Humours* (New York: Ecco, 2007), xvii–xviii.

<sup>124</sup> Arikha, *Passions and Tempers*, 18.

<sup>125</sup> Arikha, *Passions and Tempers*, 173.

<sup>126</sup> Arikha, *Passions and Tempers*, xix.

內容。<sup>127</sup>班森最初受到黑格爾的影響，接受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但並不接受其世界觀，班森不認為辯證式的對立衝突會帶來更高的發展，而只會導致對立雙方的毀滅。<sup>128</sup>在接觸了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哲學之後，班森便成為他的門徒。但之後班森開始發展自己的哲學體系，並對叔本華的哲學感到不滿，特別是後者思想中所包含的一元論(Monismus)觀點。叔本華認為世間萬物和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世界意志的一部分，而班森則認為每一個人都擁有個別的意志。<sup>129</sup>里斯所參考的《性格學研究》是班森的代表作，班森企圖藉由此作研究人的性格和心理特質，並藉由性格的不同來強調每個個體的獨特性。<sup>130</sup>這種透過心理特質來強調個人獨特性的做法，正好契合里斯對人物性格的重視。

儘管如此，班森並未嚴格區分「性格」(Charakter)和「人格」(Persönlichkeit)這兩個概念。里斯在東大的《史學方法論課程講義》裡也只談論「性格」，<sup>131</sup>而在他的《歷史知識理論》裡則將「性格」與「人格」視為兩個不同的概念：「性格」指的是一個人內在精神上的特徵，<sup>132</sup>在面對會壓抑自己性格的外來阻力時，歷史人物所展示出的是彈性、剛硬、漠然、順服或是堅韌的態度。里斯更認為這種時候才能看出一個人意志能量的持續力，也就是所謂的性格強度(Charakterstärke)。他認為若要觀

---

<sup>127</sup> Julius Bahnsen, *Beiträge zur Charakterolog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pädagogischer Fragen*, vol. 1 (Leipzig: Brockhaus, 1867), 18–50.

<sup>128</sup> Frederick C. Beiser, *Weltschmerz: Pessim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1860–19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4.

<sup>129</sup> Beiser, *Weltschmerz*, 236–238.

<sup>130</sup> Beiser, *Weltschmerz*, 238–239.

<sup>131</sup>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115–118.

<sup>132</sup> Riess, *Historik*, 211.

察人物的性格發展，歷史是唯一的寶庫。<sup>133</sup>至於「人格」，則是在與一個人物有關的事物(包含身體與心靈的關係、氣質、性格與孩童時期以來的發展等)之中，一切仍持續發揮影響力，以至於當今的人仍能清楚感受到此人獨特存在的部分。里斯認為，許多統治者在死後讓人感到他們似乎仍未逝去，正是因為他們的人格所致。<sup>134</sup>里斯認為人格的描寫是史家的義務，而且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工作，也是每一位史家在藝術能力上最重要的試煉。<sup>135</sup>

相對於朵伊森對人格描寫與心理學式詮釋的忽視，里斯相當重視人格特質的描寫。他認為蘭克與特萊契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是這方面的典範，<sup>136</sup>尤其是蘭克。在里斯整部《歷史知識理論》之中，這位史學大師不僅是被引述次數最多的作者，在討論許多主題時，里斯更時常引述蘭克的意見作為最後的定論。<sup>137</sup>

里斯對蘭克的景仰亦展現在一篇刊登於《史學雜誌》的蘭克讚詞。在這篇以〈空前絶後の最大史家〉為標題的讚詞裡，里斯以條列方式說明蘭克在史料開拓、考證方法、歷史詮釋與人物描寫等方面的卓越成就。<sup>138</sup>事實上，除了嚴謹的考證工作之外，蘭克的聲望更建立在他描寫人物的能力。從 19 世紀至 20 世紀前半，德國出版了不少的蘭克作品選集，從其中某些選集的書名，就可看出編者強調蘭克特別擅長人物的描寫，例如《蘭克史學著作裡的性格描寫》(*Charakterbilder aus Leopold*

<sup>133</sup> Riess, *Historik*, 236.

<sup>134</sup> Riess, *Historik*, 237.

<sup>135</sup> Riess, *Historik*, 238.

<sup>136</sup> Riess, *Historik*, 239.

<sup>137</sup> 例如 Riess, *Historik*, 56, 66, 113, 130, 144, 149, 176, 189, 199, 221, 239, 245, 248, 287, 301, 341, 334.

<sup>138</sup> ルットキッヒ・リース(Ludwig Riess), 〈空前絶後の最大史家〉, 《史學雜誌》, 10:1(東京, 1899), 無頁碼。

*von Ranke's historischen Werken*)和《歷史人物描寫》(*Historische Charakterbilder*)等。<sup>139</sup>在某本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的蘭克文集裡，其編者在前言稱讚蘭克能生動地描寫人物性格，強調任何一座學校裡的圖書館都應收藏蘭克的著作。<sup>140</sup>由此可見，蘭克善於描寫人物是當時許多人的共識，他的作品甚至被視為學童應模仿的典範，儘管如此，只有里斯在他的歷史理論中對此做系統性的探究。

與東大時期的史學方法論講義相比，1912年出版的《歷史知識理論》在結構上已經走出朵伊森的影響。而在東大時期就已經開始發展的系統論，在《歷史知識理論》中有進一步的演化。里斯在這部作品裡也時常引述蘭克著作強化自己的論點。與朵伊森不同，蘭克並未留下探討歷史知識性質的理論性著作，筆者認為，里斯的企圖是仿效朵伊森的方式，建立一套傾向蘭克觀點的系統性史學理論。朵伊森重視詮釋的方法，但對心理學式的詮釋抱持輕視的態度，而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並未以專門的章節討論這個主題，但他在系統論的部分深入探討人物心理的各個層面，可以說這部分就是心理學式詮釋的實踐。而正是這方面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出里斯對蘭克史學的特別偏好。

## 六、里斯與世紀之交的蘭克復興潮流

在19世紀的德國史學史中，蘭克與朵伊森的立場對立是廣為人知的事實。蘭克政治立場偏向保守，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之前列強的均

---

<sup>139</sup> Leopold von Ranke, *Charakterbilder aus Leopold von Ranke's historischen Werken*, ed. Horst Keferstein. 2. Ausg. (Frankfurt a. M.: Karl Theodor Vöcker's Verlag, 1869); Leopold von Ranke, *Historische Charakterbilder*, ed. Richard Sternfeld (Berlin: 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 1924).

<sup>140</sup> Horst Keferstein, "Vorwort," in Leopold von Ranke, *Charakterbilder aus Leopold von Ranke's historischen Werken*, III.

勢才是歐洲的正常狀態，也相信革命的浪潮終將消退，因此他對於 19 世紀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沒有太大的好感，而他主張的客觀性也與此有關，因為他認為歷史所形塑的過去就是客觀，而極端的革命或保守反動的主張則代表偏頗的黨派立場。<sup>141</sup> 朵伊森則是中間偏右的民族主義自由派，他相信普魯士背負著領導德意志民族統一的使命，更認為史家應該體認時代發展的趨勢，並站在正確的立場。他認為用檔案資料和考證方法所產生的作品只呈現了正確的資料，但這是不夠的；史家更應該運用詮釋的方法探索歷史的真理。<sup>142</sup>

朵伊森是普魯士學派史家的代表人物，這一派的史家積極鼓吹普魯士領導德國統一，更認為政治理念與歷史著作應相互結合，因此他們反對蘭克的客觀性主張。朵伊森批評所謂無黨無派的歷史書寫是「太監式的中性」，<sup>143</sup>也認為蘭克的書只能引發知識上的興趣，卻無法激起讀者的憤怒或熱情。<sup>144</sup>對普魯士學派的史家而言，德意志的統一是一未來的方向，而史家的任務便是藉由寫作向統治者和民眾指出這一點。但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後，他們的夢想已成事實，民族統一的訴求便失去指向未來的作用。

正因如此，下一代的德國史家自然更不可能延續史學前輩的路線，而必須尋找新的方向。大約自 1880 年開始，在新一代的德國歷史學者之間興起「蘭克復興」(Ranke-Renaissance)的風潮。<sup>145</sup>對這些年輕學

141 Friedrich Jaeger and 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83–85.

142 Friedrich Jaeger and 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89.

143 Droysen, *Historik*, Bd. 1, 236.

144 Johann Gustav Droysen, *Briefwechsel*, Bd. 2: 1851–1884, ed. Rudolf Hübner. Neudr. der Ausg. 1929. (Osnabrück: Biblio-Verlag, 1967), 169.

145 最早用「蘭克復興」一詞指稱這股史學風潮的是奧地利史家斯爾比克 (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 1878–1951)，參見 Heinrich von Srbik,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Bd. 2 (München:

者而言，德意志帝國不是尚待實現的目標，而是既有的客觀現狀。於是蘭克所主張的「客觀性」再次獲得推崇，它被視為通往歷史真理的唯一道路，也作為歷史學的學術合法性基礎。因為他們極度推崇蘭克，這些新一代的學者也被稱為「新蘭克學派」，以連茲(Max Lenz, 1850–1932)與馬爾克斯(Erich Marcks, 1861–1938)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sup>146</sup>

「新蘭克學派」的史家將蘭克視為近代最偉大的歷史學者，連茲甚至稱蘭克為「德國的修昔底德」(der deutsche Thukydides)。<sup>147</sup>然而，這一派史家主要繼承了蘭克史學裡對國家、強權、外交與偉大人物的看重，卻缺乏蘭克思想中的宗教性和精神性。<sup>148</sup>儘管蘭克並不支持俾斯麥的政策，<sup>149</sup>這位德意志帝國的建造者卻是新蘭克學派史家最為推崇的政治人物，連茲與馬爾克斯都為俾斯麥寫過傳記。<sup>150</sup>他們甚至將蘭克與俾斯麥並列為 1848 年後德國最重要的精神指標性人物，認為兩者都是「務實政治」(Realpolitik)的大師。新蘭克學派援引蘭克對歐洲強權均勢的重視，認為隨著世界局勢的轉變，原本的歐洲均勢狀態勢必轉變

Bruckmann, 1951), 1.

<sup>146</sup> Hans H. Krill, *Die Rankerenaissance. Max Lenz und Erich Marcks, Ein Beitrag zu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in Deutschland 1880–1935* (Berlin: De Gruyter, 1962), 1–3.

<sup>147</sup> Max Lenz, “Die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seit den Befreiungskriegen für die nationale Erziehung,” in *Kleine historische Schriften*, Bd. 2: Von Luther zu Bismarck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22), 284.

<sup>148</sup> 關於蘭克思想中的精神性與宗教情懷，近年中文著作中闡述最深入的是李孝遷與胡昌智合著的《史學旅行》，書中相關內容參見胡昌智所著的第一章〈蘭克及其史學〉，頁 17–145。

<sup>149</sup> 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 ed., 1st Wesleyan pbk. ed.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86.

<sup>150</sup> Max Lenz, *Geschichte Bismarck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2); Erich Marcks, *Otto von Bismarck. Ein Lebensbild* (Stuttgart: J. G. Cotta, 1924).

為新的世界秩序，而在這個新的世界舞台上，德國必然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因此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力支持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88–1918 在位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sup>151</sup>

里斯與新蘭克學派的史家有所往來。連茲與里斯的老師戴布呂克是柏林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兩人之間的關係相當友好。<sup>152</sup>為了能回母校教書，里斯返回德國後，在 1903 年向柏林大學申請大學任教資格，當時柏林大學哲學院的院長正是連茲，他親自擔任其中一位審查人，另一位則是戴布呂克。<sup>153</sup>通過申請後，里斯成為柏林大學的編外講師，這個等級的教師在授課主題的選擇上通常只限於被指定的範圍。根據里斯事後的說法，當時身為院長的連茲強調，里斯的課程不能只侷限在歐洲中古史與近代史的領域，「歷史」才是最適合他的範圍，<sup>154</sup>由此可見連茲對里斯教學能力的信任。

除了人際網絡之外，里斯的政治觀點及史學理念與新蘭克學派也非常接近，其中某些特質是蘭克本人也擁有的，特別是對偉大人物的重視。在抵達日本後寫給老師的第一封信裡，里斯就提到他採用蘭克著作裡的理念來設計課程，而考試的結果也讓他感到滿意，因為他的日本學生「看來也懂得要給偉大歷史人物些許的敬重，並體認到激進言論的空虛」。<sup>155</sup>馬爾克斯與繆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 1882–1964)曾合編了一套《政治大師：一個世界史的人物肖像系列》(*Meister der Politik: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Reihe von Bildnissen*, 1922)，這一套書集合了許多學者為多名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所寫的傳記，而里斯則為這個系列撰寫〈伊藤公爵〉

<sup>151</sup> Krill, *Die Rankerenaissance*, 256–257.

<sup>152</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49r.

<sup>153</sup> HU UA, Phil.Fak.01, Nr. 1226, fol.114d.

<sup>154</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61r.

<sup>155</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6v.

(Fürst Ito)，也就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的傳記。<sup>156</sup>里斯指出傳主擁有「日本俾斯麥」的稱號，<sup>157</sup>他認為伊藤博文和俾斯麥都是務實政治的信奉者，並稱讚這位日本政治家「不讓自己受限於任何框架，也不會長期地固守於某個他曾一度投身的特定計畫」。<sup>158</sup>

和其他新蘭克學派的學者相同，里斯也相當崇敬俾斯麥。1895年11月9日，橫濱發行的英文報紙《日本每週郵報》(*The Japan Weekly Mail*)刊出一篇讀者投書，抗議該報在前一期刊出詆毀俾斯麥名聲的文章。<sup>159</sup>投書者署名“Historicus”(拉丁文「史家」之意)，根據里斯在同年12月4日寫給戴布呂克的信件內容，<sup>160</sup>可以確定里斯就是這篇投書的作者。在同一年里斯也為東大學生編了《1851至1888年德國史講義，第一卷：1851–1871》(*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rman history 1851 to 1888. Vol. 1, 1851–1871*)。<sup>161</sup>講義第一卷所涵蓋的時間起自1851年，以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作為結尾。1851年是俾斯麥成為普魯士王國駐德意志邦聯大會(Bundestag des Deutschen Bundes)公使的年份，當俾斯麥在講義裡首次出場時，里斯明白地稱讚他是極為優秀的政治家，<sup>162</sup>更時常細談俾斯麥在面對各個事件時的思考和行動方式，藉此凸顯這位人物的政治智慧。里斯也曾以1898年出版的俾斯麥回憶錄為主題在東京發表演講，並讓秀

---

<sup>156</sup> Ludwig Riess, “Fürst Ito,” in *Meister der Politik: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Reihe von Bildnissen*, Bd. 2, ed. Erich Marcks and Karl Alexander Müller (Stuttgart: Dt. Verl.-Anstalt, 1922), 621–657.

<sup>157</sup> Riess, “Fürst Ito,” 621.

<sup>158</sup> Riess, “Fürst Ito,” 657.

<sup>159</sup> Historicus (Ludwig Riess), “The Events of 1870. To the Editor of the ‘Japan Mail’,” *The Japan Weekly Mail* 24:19 (November 9, 1895): 500–501.

<sup>160</sup> SBB PK NI.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fol. 27r.

<sup>161</sup> Ludwig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rman History 1851 to 1888*, vol. 1, 1851–1871 (Tokyo: [s.n.], 1895). 里斯僅編寫了此講義的第一卷。

<sup>162</sup>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rman History 1851 to 1888*, vol. 1, 34.

英舍將講稿以《俾斯麥對他政治生涯的回顧：獻給他在東京的德國同胞與他的日本聽眾》(*Bismarck's Rückblick auf seine politische Laufbahn. Seinen deutschen Landesleuten in Tokyo und seinen japanischen Hörern gewidmet*)為標題印成小冊出版。<sup>163</sup>在這篇演講中，里斯稱讚俾斯麥善於心理學式的觀察，更認為他對歷史的洞見堪比修昔底德。<sup>164</sup>由此可見里斯將心目中優秀史家必備的品質投射在俾斯麥身上，而他對俾斯麥的崇敬程度與新蘭克學派史家相似。

儘管如此，里斯並未如大部分的新蘭克學派史家一樣高舉蘭克史學的客觀性。新蘭克學派史家之所以提倡蘭克的「客觀性」，其最主要的動機是為了將「國家」，也就是俾斯麥所打造的德意志帝國，視為客觀歷史發展所致的必然結果。<sup>165</sup>如此一來，所謂的「客觀」就是站在國家的立場，而與其相對的就是不客觀的黨派立場，特別是傾向激進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天主教的立場。在史學理論的層面上，連茲等主要的新蘭克學派史家並未發表著作探討歷史知識的性質，他們認為史家可以直接認識歷史事實，而未探討人的認知能力和史家主體性在其中所發揮的影響。<sup>166</sup>連茲等人對史學理論較不關心的態度正凸顯了里斯在新蘭克學派裡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因為後者的《歷史知識理論》是唯一一部新蘭克學派學者所發表的大篇幅歷史理論著作。

---

<sup>163</sup> Ludwig Riess, *Bismarck's Rückblick auf seine politische Laufbahn. Seinen deutschen Landesleuten in Tokyo und seinen japanischen Hörern gewidmet* (Tokyo: Schueischa, 1899).

<sup>164</sup> Riess, *Bismarck's Rückblick auf seine politische Laufbahn*, 7.

<sup>165</sup> Wolfgang J. Mommsen, "Ranke and the Neo-Rankean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4–140. Here 132–133.

<sup>166</sup> Wolfgang J. Mommsen, "Ranke and the Neo-Rankean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137–138.

里斯在這部著作裡多次提到蘭克，但未曾在書中強調蘭克的客觀性。<sup>167</sup>在《歷史知識理論》裡，與客觀性略為有關的是里斯對時代精神與史家立場的討論，在此他提到上一代的德國史家，如蒙森、朵伊森和須貝爾(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等人(里斯在柏林大學修過前二者的課)，指出這些前輩在著作裡展示自己的立場，藉此讓過去的歷史發揮強大的政治影響力。<sup>168</sup>里斯對此的評論是：

成功的歷史教訓會帶來無比的實用價值，這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為了宣傳時代精神這個誘惑而做所謂的政治性歷史寫作，它對學術真理的傷害最常被解釋為傾向性操作。在每次史料研究之中，我們首要的期盼是說明其作者受到了時代精神的影響，因為這是讓史家偏離任務的最大危險。史家的任務在於「將人類的真實面貌，無論是可解釋還是無法解釋的，用最認真的態度展示出來。」<sup>169</sup>

由此可見，里斯與其他新蘭克學派史家都批評上一代史家將歷史與政治立場結合的做法。但他不至於因此像其他新蘭克學派成員一味地宣揚蘭克的客觀性，畢竟連茲等人所理解的蘭克史學忽視了史家主體性，而這隱含了傾向實證主義的危險。因此里斯在批評前輩史家將個人立場與歷史研究混淆的同時，也強調史家任務在於展現人類的真實面貌，根據里斯對史料性質的區分，這主要屬於「意識資料」的範疇，也就是專屬於歷史學、與人類心理和歷史記憶有關的資料。

---

<sup>167</sup> 在 1899 年刊登於《史學雜誌》的蘭克讚詞裡，里斯確實提到「蘭克的描寫能力達到絕妙的境界，其生氣勃勃，但也力求中正，不偏不倚，這是所有讀者都認可的特質」。但里斯的這段文字主要是為了稱讚蘭克的敘事能力，同時強調蘭克不會為了文字效果而採偏頗立場。參見：リース，〈空前絶後の最大史家〉，無頁碼。

<sup>168</sup> Riess, *Historik*, 344.

<sup>169</sup> Riess, *Historik*, 345.

從里斯與連茲等人觀點的差異，我們可再探究「新蘭克學派」概念的範疇與內涵，其源自於 1890 年代德國史學界一場以史家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為中心的方法論論戰，這場論戰在史學史上被稱為「蘭普雷希特爭論」(Lamprechtstreit)或「史學方法爭論」(Methodenstreit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在這場論戰中，蘭普雷希特將對手稱之為「向後倒退的青年蘭克主義者」(die rückwärts gewandten Jungrankianer)，<sup>170</sup>而「新蘭克主義者」一詞便是由此衍生而來。這場爭論的起因是蘭普雷希特自 1891 至 1909 年間發表的 12 卷《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在這部著作裡，他將德國歷史分為五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各有一種主導的集體心理狀態。<sup>171</sup>這部作品遭到主流史家的批評，包括貝洛(Georg von Below, 1858–1927)、拉赫法爾(Felix Rachfahl, 1867–1925)、連茲、戴布呂克、翁肯(Hermann Oncken, 1869–1945)等人都曾嚴厲批評蘭普雷希特在此書中所用的方法。廣義來說，除了經濟史家貝洛之外，前述所有批評蘭普雷希特的史家都可被視為新蘭克學派的成員。<sup>172</sup>至於此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馬爾克斯，他與蘭普雷希特同在萊比錫大學任教，起初為了維持同事情誼和學術上的合作關係，而在這場論戰中維持中立態度，但最後兩人還是因故起了爭執，導致關係破裂，馬爾克斯也因此轉赴海德堡大學工作。<sup>173</sup>

<sup>170</sup> Karl Lamprecht,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erlin: Gaertner, 1896), 2.

<sup>171</sup> 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d. 1, 2. u. durchges. Aufl. (Berlin: R. Gaertn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94), 1–26; Cf. 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6–1915). Studies in German Historie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3), 123.

<sup>172</sup> Heinrich von Srbik,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Bd. 2, 6–17.

<sup>173</sup>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272–274.

蘭普雷希特曾多次發文反擊他的批評者，在其中一篇名為〈蘭克的觀念論與青年蘭克主義者〉(“Rankes Ideenlehre und die Jungrankianer”)的文章裡，他批評老派史家只重視歷史人物的意圖，並因此將一切形式的因果解釋方法排除在史學研究之外。他進一步反問，難道個別人物不會毫無意圖地行動嗎？他認為在人的意識之外，還有一個屬於習慣性和習俗性行為、無限廣大的領域，每個人都採取一致的行動方式，而個體性在此則退居幕後。在蘭普雷希特看來，這個領域的人類行為正適合用統計的方式研究。因此，他將史學方法分為兩種對立的類型，其中一類重視個體的層面，另一類則重視普遍性和集體性的層面。<sup>174</sup>蘭普雷希特指出蘭克受到德意志觀念論的影響。他認為蘭克時常提到歷史發展的奧秘，希望從世界史的整體關聯中看到上帝，而擁有一種神秘主義的世界觀。<sup>175</sup>蘭普雷希特藉此批評蘭克的史學方法缺乏足夠的學術性。

蘭克本人未像朵伊森以系統性的方式闡述自己的史學理論，而美國史家羅傑·奇克林(Roger Chickering)也在他所寫的蘭普雷希特傳記裡指出，在他所引發的爭論裡，爭論的雙方都將焦點放在攻擊對手的缺點，卻未對自己的史學方法做深刻的省思。<sup>176</sup>如前所述，蘭普雷希特強調個人的企圖與目的無法涵蓋所有的歷史研究對象，他重視集體心理的階段性發展，認為這樣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可以用統計學或其他科學方法分析。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裡批評蘭普雷希特將一個民族的發展區分為幾個不同的集體精神發展階段，而該民族隨著階段的發展，個人受制於集體意識的程度愈來愈低，而個體的自主性則愈來愈高。里斯認為這是一種抽象觀點，更指出，蘭普雷希特將不符合自己

<sup>174</sup> Lamprecht,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6.

<sup>175</sup> Lamprecht,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34–36.

<sup>176</sup>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186.

理論的人類生活經驗加以剔除，而這與黑格爾用世界精神(Weltgeist)來解釋歷史發展的做法並無二致。<sup>177</sup>

在《歷史知識理論》出版之前，里斯曾和蘭普雷希特及其學生李奧(Justus Leo, 1880-?)有過一場小規模的論戰。1906年，李奧出版博士論文《日本最古時期的精神生活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ältesten japanischen Seelenlebens*)，他在前言指出此作的靈感來自於蘭普雷希特的德日文化比較課程，並認定「在視覺藝術和經濟生活中，這兩個根源和文化環境相去甚遠的民族有著大規模的一致性，這其中某些部分特別引人注目。這一致性不僅限於表面和形式，也顯現在內在的精神發展上」。<sup>178</sup>李奧在論文裡分析《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裡的詩歌，藉此掌握西元8世紀之前日本人的集體心理狀態，以證實蘭普雷希特的觀點。

隔年里斯在《德意志文學報》(*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上針對李奧的新書發表了批判性的評論。里斯指出使用德譯版的日本史料，顯示李奧缺乏日語能力，也批評他將日本人在7世紀經歷的集體心靈的轉變作為該民族之所以接受中國文化和佛教文化影響的原因。里斯強調作者為了套用老師的理論而倒果為因。<sup>179</sup>針對學生所受的嚴厲批評，蘭普雷希特在同一份刊物親自撰文反駁里斯。蘭普雷希特強調他並未強迫學生採用自己的理論，而是李奧親自研究史料之後才逐漸接近老師的觀點。<sup>180</sup>與蘭普雷希特之前經歷過的幾場論戰相比，這次論戰的規模不

---

<sup>177</sup> Riess, *Historik*, 44.

<sup>178</sup> Justus Leo, *Die Entwicklung des ältesten japanischen Seelenlebens: nach seinen literarischen Ausdrucksformen* (Leipzig: Voigtländer, 1906), 1.

<sup>179</sup> Ludwig Riess, Rezension zu Saneyoshi im Okzident von O. Tyrka, *Die Entwicklung des ältesten japanischen Seelenlebens nach seinen literarischen Ausdrucksformen* von Justus Leo und *Japans Frauen und Frauenmoral* von Shingoro Takaishi.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18 (Mai 1907), 1112–1113.

<sup>180</sup> Karl Lamprecht, "Verwahrung,"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21 (Mai 1907),

算太大，此後兩人又在這份刊物上發了幾封針鋒相對的短文。李奧最後一篇回應里斯的文章以〈反對里斯先生和一種僅是語言文獻學觀點的日本史〉（“Wider Herrn Rieß und wider eine nur philologische Betrachtung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為標題。此文的結論是，里斯批評他的原因在於他的老師，因為蘭普雷希特被只會文字考證的學者排除在「史家行會」之外。<sup>181</sup>在這場論戰裡，里斯強調李奧錯誤地套用老師的理論，更缺乏對日本史和相關史料的認識，而李奧則批評里斯固守以文字考證為主的傳統史學方法，對新的研究方法缺乏包容和理解。

兩方的論戰最後流於意氣之爭，而里斯也並非「只會文字考證」的歷史學者。相較蘭普雷希特對集體心理狀態的重視，里斯在《歷史知識理論》裡相當強調個人的心理狀態，更將歷史研究的對象定義為「整個目的的領域」，也就是與人類意圖有關的領域。因此里斯在系統論中以極大的篇幅討論個人心理現象的各個層面，這部分的內容則早在東大時期的《歷史方法論講義》裡就已經開始發展。當代學者約翰·布朗利(John S. Brownlee)認為系統論是整份講義中最不科學的部分，更批評里斯依氣質區分心理類型的做法。<sup>182</sup>但筆者以為這反而是這部講義裡最獨特也最重要的部分，因為里斯在此試圖以系統性的方式探討歷史人物的心理特質，藉此強調個人心理特質在史學研究裡的重要性。

里斯在東大的《歷史方法論講義》裡尚未提到蘭普雷希特的著作，但他在此作裡早已對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等實證主義史家提出類似的嚴厲批評，因為「他們(巴克爾等人)堅決主張，所有現象都

---

1312–1313.

<sup>181</sup> Justus Leo, “Wider Herrn Rieß und wider eine nur philologische Betrachtung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45 (November 1907), 2878.

<sup>182</sup>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79.

只是自然力量依照公式機械式運作的結果……如果歷史想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找出主掌所選之個別現象的律則」。<sup>183</sup>然而里斯認為：

歷史[學]從一開始就有一種非常不同的前提，這意味著，確實有著擁有自我意識、能自由行動、在變化之中卻能維持自我身分的生命。……如果現在巴克爾等人否認歷史[學]的這個前提……那就像是有人否認原子和自然力量永遠遵循同一個公式運作一樣。<sup>184</sup>

筆者認為，反駁巴克爾與蘭普雷希特等人套用公式於歷史研究的做法和他們對人物個體性的忽視，正是里斯發展知識理論的重要動機之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里斯反對理論的套用，所以他在自己的歷史著作裡並未公式化地套用自己的《歷史知識理論》。以他在 1909 年發表的專書《教宗保祿四世與他的姪子們：十六世紀的一個世界史危機》為例，這部著作改編自他在 1903 年申請大學任教資格的論文，在這樣一部重要的作品中，儘管充滿歷史人物的描寫，但里斯並未大量地、系統性地將《歷史知識理論》裡採用的術語，如「黃膽液質」或「多血質」等，套用在對歷史人物的描寫和分析之中。

可以說里斯雖然自視為蘭克門徒，卻並非一個毫無創造力的主流追隨者。里斯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為了捍衛歷史主義的史學傳統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理論。他參考朵伊森的理论框架建構一套自己的史學理論，並藉此系統性地說明蘭克沒有用理論闡明的觀點：對人性的掌握和描寫就是史家最重要的任務。

---

<sup>183</sup>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13.

<sup>184</sup> Riess,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14–15.

## 七、結論

里斯於 1861 年年底出生在普魯士王國裡的一個德語猶太裔家庭，俾斯麥在他出生的隔年成為普魯士首相。在里斯的童年時代，俾斯麥藉由三場戰爭建造了德意志帝國，而在里斯的青少年時期，德國人仍沉浸在帝國建立的歡愉情緒之中。也因此里斯在文化上認同德意志的文化傳統，而政治上則認同德意志帝國的體制。

1880 至 1884 年，里斯在柏林大學接受歷史主義史學的薰陶，並以英格蘭史為專業領域。1887 年他前往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協助日本建立現代的專業史學，在史學相關科系、專業歷史協會和專業史學期刊的創建都扮演了諮詢者與推動者的角色，更在史學方法與世界史教學上做出重要貢獻。此時里斯開始研究日本歷史，特別擅長以歐洲的檔案和文獻資料探討日本涉外的歷史。在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他更成為第一位撰寫臺灣歷史的西方專業史家。

基於他所擁有的 15 年日本經驗，里斯可說是新蘭克學派史家中最特殊的一員。在日本任教的期間，他離開了高度專業化與研究領域分化的德國史學界，在東亞島國致力於專業史學的奠基，並因此而激發了對歷史與史學的基本問題的反思。為了教學所需，他為日本學生編寫數種課程的講義，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史學理論。回到德國之後，他將在日本所累積的成果和構想進一步發展，其成果主要展現在 1912 年出版的《歷史知識理論》之中。

里斯的歷史理論在架構上深受朵伊森的影響，但實際上他更景仰蘭克的史學。里斯極度推崇蘭克描寫歷史人物的能力，為了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分析人物性格，他在《歷史知識理論》裡深入探討朵伊森所忽視的個人心理現象，同時也藉由此書來對抗蘭普雷希特等人所提倡

的新史學理論。蘭普雷希特曾批評蘭克史學含有神秘主義的世界觀，因此學術性不足。蘭克本人並未留下能為自己辯駁的歷史理論著作，我們可以說，用有系統且清楚的方式闡明蘭克史學中的神秘成份，這應該是里斯撰寫《歷史知識理論》的一個重要動機。與其他新蘭克學派學者相比，里斯並未一味高舉蘭克的客觀性，而是強調蘭克掌握和描繪人物特色的能力，更將此視為歷史學最重要的任務，並為了強調掌握人物心理的重要性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系統論，以捍衛歷史學的獨立性。里斯藉由這套理論對抗社會學等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的挑戰，同時也避免了其他同事忽視史家主體性，而僅強調檔案史料所導致的實證主義傾向。

除了史學方法論之外，世界史課程也是里斯在東大講授的重要課程。返回德國後，他藉由新編的《喬治·韋伯世界史》延續蘭克的世界史寫作理念。里斯的世界史觀念也是他史學思想中相當重要的部分，而且與他的史學理論密切相關。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文僅探討里斯的歷史理論。值得注意的是，不論里斯在東大的《史學方法論課程講義》，還是 1912 年出版的《歷史知識理論》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在兩作未實現的續作裡，里斯都提到自己將以歷史哲學作為結論討論的主題。李孝遷與胡昌智對此評論：「[史學方法論課程]講義第七章“Philosophy of History”，實際上沒有寫出，或在他看來，歷史哲學並非十分緊要的東西。」<sup>185</sup>實情如何已不得而知，畢竟里斯本人並未留下對此事的說法。儘管如此，我們可以從里斯的其他著作——特別是以世界史為主題的著作——窺探其歷史哲學的輪廓，包括他對歷史發展的觀點，以及東亞經驗對其世界史觀點產生的影響等。基於這些主題在他史學思想中的重要性，筆者將另文探討里斯的世界史觀點，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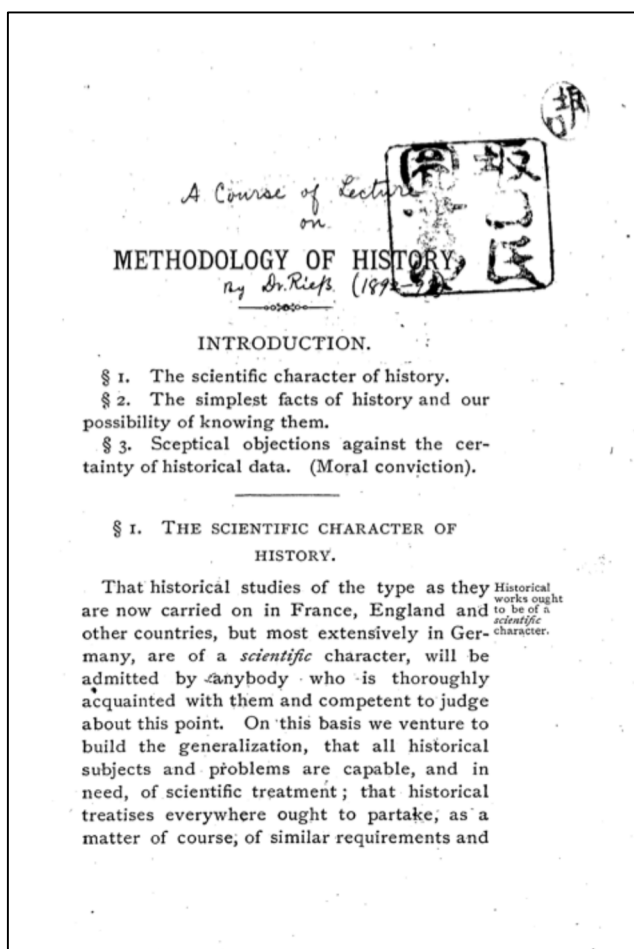
<sup>185</sup> 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頁 315。

分析東亞地區在他史學思想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於 2024 年 3 月 4 日收稿；2025 年 5 月 19 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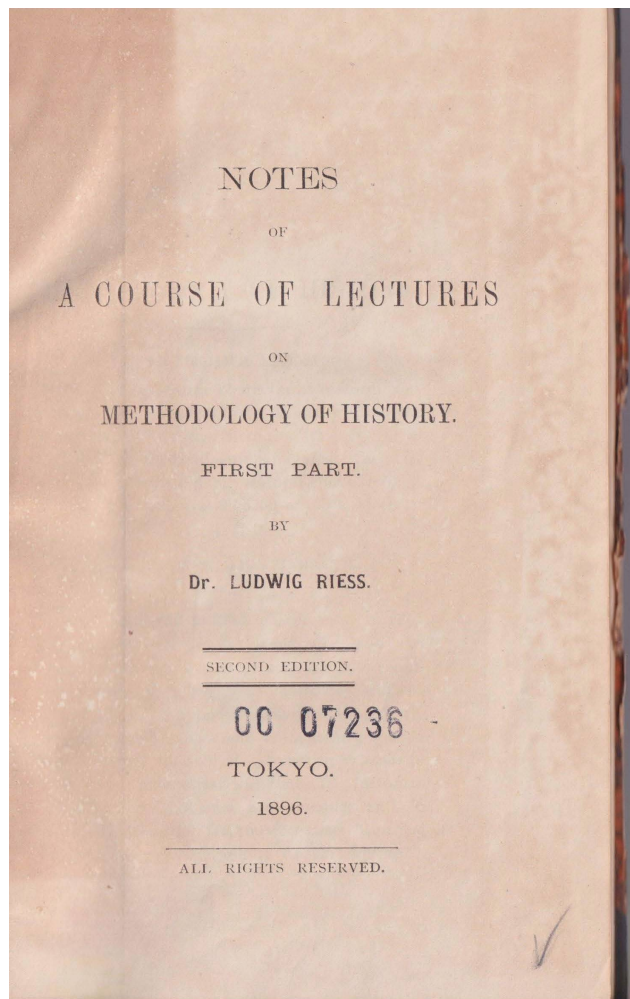
\*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德國史家Ludwig Riess 與德國史學中的『蘭克復興』」(MOST 109-2410-H-004-190-MY2)的部分成果。筆者衷心感謝胡昌智教授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為本文提供許多重要的修正意見及書目資訊。

附圖1 里斯《史學方法論講義》第一版封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索書號：D16 R54z)

附圖2 里斯《史學方法論講義》第二版封面



資料來源：筆者私人收藏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文獻

#### (一) 未出版之檔案與手稿

HU UA, Universitäts-Registatur. Lit. A. No. 6. Vol. 736, No. 21: Abgangs-Zeugnisse vom 1. bis 31. Dezember 1884. No. 1 bis 61 — 柏林洪堡大學檔案(Universitätsarchiv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1884年12月1日至31日離校成績紀錄，里斯在此卷宗裡的編號是第21號。

HU UA, Phil. Fak. 01. Prom., Nr. 265 — 柏林洪堡大學檔案：哲學院博士學位授予檔案

HU UA, Phil. Fak. 01, Nr. 1226 — 柏林洪堡大學檔案：哲學院大學任教資格授予檔案

HU UA Phil. Fak. 01, Nr. 1469 — 柏林洪堡大學檔案：哲學院教授與講師聘任檔案

HU UA, Phil. Fak. 01, Nr. 1471 — 柏林洪堡大學檔案：哲學院教授與講師聘任檔案

HU UA UK Personalia, R 145 Riess, Ludwig — 柏林洪堡大學檔案：路德維希·里斯人事檔案

SBB PK Nl. Hans Delbrück, Briefe, Riess, Ludwig —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手稿部門所藏漢斯·戴布呂克遺物：路德維希·里斯書信

#### (二) 已出版之文獻

《東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上册》，東京：東京帝国大学，1932。

ルットキッヒ・リース(Ludwig Riess)，〈和蘭國ヘーグ市ニ於ル日本歴史ニ關スル古文書〉，《史學雜誌》，7：6(東京，1896)，頁453-460。

ルットキッヒ・リース，〈空前絶後の最大史家〉，《史學雜誌》，10：1(東京，1899)，無頁碼。

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著，胡昌智譯，《歷史知識的理論》，臺北：聯經出版

- 事業公司，1987 第一版第二次印行。
- 村上直次郎，〈思い出話〉，收入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会編，《キリシタン研究：第 12 輯》，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頁 31-44。
- 幸田成友，《凡人の半生》，東京：共立書房，1948。
- 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 Bahnsen, Julius. *Beiträge zur Charakterolog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pädagogischer Fragen*. Vol. 1. Leipzig: Brockhaus, 1867.
- Bernheim, Ernst.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it Nachweis der wichtigsten Quellen und Hilfsmittel zum Studium der Geschichte*. 5. u. 6., neu Bearb. u. verm. Aufl.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 Breisach, Ernst.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Burrow, John 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London: Allen Lane, 2007.
- Degener, Hermann, ed. *Wer ist's? Biographien von rund 20000 lebenden Zeitgenossen*. 8. Aufl. Leipzig: Degener, 1922.
- Droysen, Johann Gustav. *Briefwechsel*. Bd. 2: 1851-1884, edited by Rudolf Hübner. Neudr. der Ausg. 1929. Osnabrück: Biblio-Verlag, 1967.
- Droysen, Johann Gustav. *Grundriss der Historik*. 3. umgearb. Aufl. Leipzig: Veit & Comp., 1882.
- Droysen, Johann Gustav.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Bd. 1: Rekonstruktion der ersten vollständigen Fassung der Vorlesungen (1857) Grundriß der Historik in der ersten handschriftlichen (1857/1858) und in der letzten gedruckten Fassung (1882), edited by Peter Leyh.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7.
- Droysen, Johann Gustav. *Historik: Historische-Kritische Ausgabe*. Bd. 3, 2: Die "Historik"-Vorlesungen »letzter Hand«: Textvarianten, editorischer Bericht und werkbiographisches Nachwort, edited by Horst Walter Blank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2020.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d. 1: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edited by Johannes Hoffmeister. 5th ed. Hamburg: Meiner, 1955.
- Historicus (Ludwig Riess). "The Events of 1870. To the Editor of the 'Japan Mail'." *The*

- Japan Weekly Mail* 24:19 (November 9, 1895): 500-501.
- 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ed.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21: Pütter-Rohlf'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2.
- Humboldt, Wilhelm von. "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In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edited by Andreas Flitner and Klaus Giel.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5 Bänden, Bd. 1, 585–606.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60.
- Lamprecht, Karl. "Verwahrung."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21 (Mai 1907): 1312–1313.
- Lamprecht, Karl.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erlin: Gaertner, 1896.
- Lamprecht, Karl. *Deutsche Geschichte*. Bd. 1. 2. u. durchges. Aufl. Berlin: R. Gaertn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94.
- Lenz, Max. "Die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seit den Befreiungskriegen für die nationale Erziehung." In *Kleine historische Schriften*. Bd. 2: Von Luther zu Bismarck, 275–295.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22.
- Lenz, Max. *Geschichte Bismarck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2.
- Leo, Justus. "Wider Herrn Rieß und wider eine nur philologische Betrachtung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45 (November 1907), 2878.
- Leo, Justus. *Die Entwicklung des ältesten japanischen Seelenlebens: nach seinen literarischen Ausdrucksformen*. Leipzig: Voigtländer, 1906.
- Marcks, Erich. *Otto von Bismarck. Ein Lebensbild*. Stuttgart: J. G. Cotta, 1924.
- Mommsen, Theodor. "Rede bei Antritt des Rektorates." In Theodor Mommsen, *Rede und Aufsätze*, 3–16. Berlin: Weidemann, 1905.
- Ranke, Leopold von. *Charakterbilder aus Leopold von Ranke's historischen Werken*, edited by Horst Kefenstein. 2. Ausg. Frankfurt a. M.: Karl Theodor Völcker's Verlag, 1869.
- Ranke, Leopold von. *Historische Charakterbilder*, edited by Richard Sternfeld. Berlin: 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 1924.
- Riess, Ludwig. "Der Aufstand von Shimabara, 1637–1638. Nebs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benutzten Quellen."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in Tokio* 5:45 (1891): 191–214.
- Riess, Ludwig. "Der Ursprung des englischen Unterhause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60:1 (1888): 1–33.
- Riess, Ludwig. "Fürst Ito." In *Meister der Politik: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Reihe von*

- Bildnissen*. Bd. 2, edited by Erich Marcks and Karl Alexander Müller, 621–657. Stuttgart: Dt. Verl.-Anstalt, 1922.
- Riess, Ludwig.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in Tokio* 6:59 (1897): 405–447.
- Riess, Ludwig. *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Bein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Vol. 1. Tokyo: Fusambō, 1899.
- Riess, Ludwig. *Allerlei aus Japan*. Vol. 1. 2. Aufl. Berlin: Expedition der Deutschen Bücherei, 1905.
- Riess, Ludwig. *Allerlei aus Japan*. Vol. 2. 2. Aufl. Berlin: Expedition der Deutschen Bücherei, 1905.
- Riess, Ludwig. *Bismarck’s Rückblick auf seine politische Laufbahn. Seinen deutschen Landesleuten in Tokyo und seinen japanischen Hörern gewidmet*. Tokyo: Schueischa, 1899.
- Riess, Ludwig. *Die Politik Pauls IV. und seiner Nepoten: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Krisis des 16. Jahrhunderts*. Berlin: Emil Ebering, 1909.
- Riess, Ludwig. *Georg Webers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in 16 Bänden*. Bde. 1–4. 3. Aufl. Leipzig: Wilhelm Engelmann, 1919–1922.
- Riess, Ludwig. *Georg Webers Weltgeschichte in 2 Bänden*. Bde. 1–2. 3. Aufl. Leipzig: Wilhelm Engelmann, 1918.
- Riess, Ludwig. *Historik, ein Organon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 Vol. 1. Berlin: De Gruyter, 1912.
- Riess, Ludwig.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ed.]. [Tokio?]: [s.n.], [c.1892–1893].
- Riess, Ludwi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rman History 1851 to 1888*. Vol. 1, 1851–1871. Tokyo: [s.n.], 1895.
- Riess, Ludwi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 1st Part. 2nd ed. Tokyo: [s.n.], 1896.
- Riess, Ludwig. Rezension zu *Saneyoshi im Okzident* von O. Tyrka, *Die Entwicklung des ältesten japanischen Seelenlebens nach seinen literarischen Ausdrucksformen* von Justus Leo und *Japans Frauen und Frauenmoral* von Shingoro Takaishi.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18 (Mai 1907), 1111–1113.
- Riess, Ludwig. *Weber-Riess Weltgeschichte in Drei Bänden*. Bde. 1–3. 2. Aufl. Leipzig: Wilhelm Engelmann, 1924.

## 二、近人論著

- 〈リース Riess, Ludwig〉, 收入《岩波西洋人名辭典》, 東京: 岩波書店, 1956, 頁 1639。
- 早島瑛, 〈近代ドイツ大学史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 《商學論究》, 50: 1(西宮, 2002), 頁 565-592。
- 西川洋一, 〈ベルリン国立図書館所蔵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書簡について〉, 《国家学会雑誌》, 115(東京, 2002), 頁 383-427。
- 西川洋一, 〈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 收入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 《歴史学と史料研究》(東京: 山川出版社, 2003), 頁 202-233。
- 李孝遷、胡昌智, 《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林健太郎, 〈リース博士のこと〉, 《文藝春秋》, 51: 12(東京, 1973), 頁 82-84。
- 金井圓, 〈ルトヴィヒ・リースと日本関係海外史料〉, 《史學雜誌》, 87: 10(東京, 1978), 頁 1449-1459。
- 金井圓, 《お雇い外国人: 人文科学》, 東京: 鹿島出版会, 1976。
- 金井圓、吉見周子編, 《我が父はお雇い外国人: 加藤政子談話》, 東京: 合同出版, 1978。
- 姚紹基, 〈導讀〉, 收入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著, 姚紹基編譯, 《福爾摩沙島史》, 臺南: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9, 頁 2-15。
- 張隆志, 〈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 《臺灣史研究》, 16: 4(臺北, 2009), 頁 161-184。
- 藍弘岳, 〈近代日本帝國大學「新史學」的發展與臺灣史研究〉, 《新史學》, 33: 1(臺北, 2022), 頁 13-67。
- Arikha, Noga. *Passions and Tempers: A History of the Humours*. New York: Ecco, 2007.
- Beiser, Frederick C. *Weltschmerz: Pessim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1860-19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Berg, Gunter. *Leopold von Ranke als akademischer Lehrer: Studien zu seinen Vorlesungen und seinem Geschichtsdenk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8.
- Brownlee, John S.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The Age of the Gods and Emperor Jinnmu*. Paperback repr. Vancouver: UBC Press, 1999.
- Chickering, Roger.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6-1915)*. *Studies in German Historie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3.

- Dainat, Holger. "Mitschrift, Nachschrift, Referat, Korreferat."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40:2 (Januar 2015): 306–328.
- Facius, Michael. "A Rankean Moment in Japan: The Persona of the Historia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 1900."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9:1 (October 2020): 1–24.
- Iggers, Georg G.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 ed., 1st Wesleyan pbk. ed.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Iggers, Georg G.,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7.
- Jaeger, Friedrich, and 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C.H. Beck, 1992.
- Kefenstein, Horst. "Vorwort." In Leopold von Ranke, *Charakterbilder aus Leopold von Ranke's historischen Werken*, edited by Horst Kefenstein. 2. Ausg., III. Frankfurt a. M.: Karl Theodor Vöcker's Verlag, 1869.
- Kentarō, Hayashi, "Ludwig Riess, einer der Väter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Japan." In *Japan-Sammlungen in Museen Mitteleuropas: Geschichte, Aufbau und gegenwärtige Probleme*, edited by Josef Kreiner and Maria-Verena Blümmel, 31–45. Bonn: Förderverein "Bonner Zeitschrift für Japanologie", 1981.
- Krill, Hans H. *Die Rankerenaisance. Max Lenz und Erich Marcks, Ein Beitrag zu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in Deutschland 1880–1935*. Berlin: De Gruyter, 1962.
- Kublin, Hyman. "Riess, Ludwig."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17, edited by Michael Berenbaum and Fred Skolnik, 294.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7.
- McClelland, Charles E. *The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Mehl, Margaret. *Eine Vergangenheit für die japanische Nation: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chen Forschungsinstituts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1869–1895)*. Frankfurt am Main: P. Lang, 1992.
- Mehl, Margaret. *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 Mommsen, Wolfgang J. "Ranke and the Neo-Rankean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In

-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ited by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124–140.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Nishikawa, Yoichi. “‘Genius des Okzidents’: zur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ür das moderne Staatsdenken in Japan.” *Zeitschrift für Staats- und Europawissenschaften* 5:3–4 (2008): 334–357.
- Srbik, Heinrich von.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Bd. 2. München: Bruckmann, 1951.
-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1st. pbk. print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Torstendahl, Rolf. “Fact, Truth, and Text: The Quest for a Firm Basis for Historical Knowledge around 1900.” *History and Theory* 42:3 (2003): 305–331.
- Walravens, Hartmut. “Zum publizistischen Wirken von Ludwig Rieß (1861–1928) in Japan und Deutschland. Ein Schriftenverzeichnis.” *Japonica Humboldtiana* 20 (2018): 257–276.
- Weber, Wolfgang, ed. *Biographisches Lexiko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die Lehrstuhlinhaber für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des Faches bis 1970*. 2. Aufl. Frankfurt am Main: P. Lang, 1987.
- Woolf, Daniel R., Stuart Macintyre, Juan Maignashca, Attila Pók, and Ian Hesketh,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4: 180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he Historical Theory of Ludwig Riess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Chih-hu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theory of German-Jewish historian Ludwig Riess (1861–1928) and its intellectual origins. Riess taught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for fifteen years (1887–1902), playing a key role in modernizing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He began formulating his historical theory during his time in Japan, further developed it after returning to Germany, and published *Historik*, his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work, in 1912. This paper explores Riess's historical theor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iographical developments in Japan and Germany,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of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and 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contemporary perceptions of Riess among East Asian and Western historians. The second introduces Riess's life and academic career. The third examines hi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Japan, arguing that this experience motivat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historical theory. The fourth section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ess's historical theory, particularly i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his teachers. The fifth analyzes *Systematik*, the most distinctive element of Riess's historical theory, showing how he considered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figures' personal character the historian's central task. The sixth section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Rankean School" to which Riess belonged,

clarifying his relationship to other historians in this tradi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Riess greatly admired Ranke's skill in portray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s of historical figures but recognized that Ranke never articulated his own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spired by Droysen, Riess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 historical theory to interpret Ranke's historiography and defend German Historicism's emphasis on great individuals against newer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that prioritized social structures and collective psychology.

**Keywords: historical theory, German historicism, Ludwig Riess, Leopold von Ranke, Johann Gustav Droysen, Neo-Rankean School**